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泰同盟及泰国华侨

村岛 英治 (村嶋英治, Eiji Murashima) 著
日本国东京都新宿区西早稻田 1-21-1
早稻田大学大学院亚细亚太平洋研究科教授

姜元武 (Jiang Yuanwu) 译

〈序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漫长岁月里,作为泰国政府的英国人顾问 W. D. Reeve 在 1951 年里就明确而大胆地指出,泰国国内除了华侨问题以外,不存在影响政治统治的根本问题。W. D. Reeve 认为,华侨人数占泰国总人口的 20%,泰国的华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商业,金融,贸易等领域的主导权,而且当时泰国国内的劳动人口和手工业者实际上也都是由泰国华人构成。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泰国华侨,工作勤劳,又富有企业家精神,但在内心深处他们依然忘不了自己的中国人情怀。日常生活中华侨们使用汉语进行相互沟通,保留着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可以说这些华侨们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意要远大于对泰国。与此相比,泰国人就显得政治意识淡薄,生活上的安定也使得泰国人缺乏对政治的不安和危机感¹。通过上述几点,我们不难看出泰国国内华侨问题的重要性。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开始,泰国就对华侨的入境的问题采取了限制措施。此外,对华侨所带来的共产主义势力的恐惧,使得到了 50 年代以后泰国政府不但加紧了对华人入境的管理,也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在泰国国内华侨的同化政策。70 年代以后,虽说华侨问题在泰国已日趋淡薄²,但 1950 年以前的华侨问题是泰国近代史上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强行进驻泰国以前泰国华人的政治运动以及泰国政府的对应,笔者已在别稿中进行过论述³,在此仅简单作以解释。

太平洋战争之前,泰国华侨内部存在着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党系的政治运动。但直至 1946 年为止,泰国国民的一切政党运动都被加以禁止的情况下,华侨内两党的活动也自然地被扣上了非法的“帽子”。20 年代后期,5.30 运动及“济南惨案”爆发后,以萧佛成等人为首的国民党派系展开了积极的反英反日运动。但进入 30 年代后,由于泰国指导部西南派与蒋介石一派的分裂,加上泰国政府的镇压,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的这一阶段里,萧佛成一派的运动陷入了极端的低迷状态。另一方面,1924 年共产党派系的华侨组织运动开展后,泰国政府以英方提供的情报为依据,对华侨组织运动进行了反复的镇压。南洋共产党暹罗特别委员会的华侨组织运动在严峻的环境下,直到 30 年代初期一直都坚持着相对活跃的斗争。1930 年以后,共产党派系的华侨组织运动归并入暹罗共产党的旗下,为争取革命政权的尽早实现,一方面对泰国国民进行着积极的宣传,同时也通过组织暹罗共青团,暹罗反帝大同盟,暹罗赤色总工会等逐步充实壮大自己的队伍。在 1935 年召开的第三国际第七届大会⁴上,新的活动方针转换得以确定。受其影响,此后共产党在泰国的革命活动一转为抗日运动。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泰华侨中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国共两党派系的活动也更为蓬勃。此外,抗日战争时期里,也孕育产生了众多无党派的青年爱国组织。国民党方面创立了泰国华侨抗敌救国后援会,劝募公债泰国分会,三民主义青年团等新组织。同时,将中心放置于以西南派的萧佛成为主流的潮州会馆派(蚁光炎等人)和蒋介石系下的陈守明派,开展了抗日活动。共产党一方,一手对暹罗共产党时代的大众组织进行整顿,另一手又在刘漱石,李华,丘及等领导人的带领下,联合劳动,文化,学生,妇女,商人等各界抗日团体组成了泰国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抗联)。在泰华侨通过这些组织积极为中国国内的抗战团体筹备募捐,发行公债,提供衣食,甚至一部分华侨还返回祖国义勇从军,或者从事义务救援活动,在人力,物力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外,华侨组织还举行抵制日货运动。对在泰国国内经销日本商品或者那些提供给日本公司泰国产品的商人采取了一系列的惩罚措施。其中,一些抗联及无党派的青年爱国团体甚至还对与日本经济断交采取不合作的“奸商”华侨采取了武力报复。众多支持国民党的大商人因此也受到了一定的恐吓。

¹ W. D. Ree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Siam* (London: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1),p.8-9.

² 围绕着战后泰国国内华侨的同化问题,参看村岛英治著《泰国国内中国人的同化问题》,载于冈部达味编《东南亚的国民统一以及地域的合并》东京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1989 年 115-141 页。

³ 村岛英治著《泰国华侨的政治运动-从 5.30 运动到日中战争》,载于原不二夫编 1993 年《东南亚的华侨与中国-从回归中国的意识到华人意识的发展》东京 亚洲经济研究所 263-364 页。此外,本论文在经过修改后的泰语专题论文增订版《暹罗华人政治:1924-1941 期间泰国华侨的政治运动》(曼谷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刊,1996 年)由朱拉隆功大学的亚洲研究所在 1996 年做了第一次出版。北京大学的泰国研究所傅增有副教授在《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著作学术卷》(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年版)的第 489-490 页中对本书的做了简要介绍。

⁴ 在本次大会上,暹罗共产党被提案做为第三国际的支部之一,但以暹罗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之间无法保持定期联系为由,该案最终被否决(俄国国立社会政治史文书馆 Fond 494/Opis 1/Delo 447/List 1-2)。栗原浩英教授在有关第三国际的资料方面,给与了很多指教,在此深表谢意

1932年6月，泰国国内的人民党取得了立宪革命的成功，国王的绝对权利相应受到了限制。但由于人民党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容不下国内异己分子的存在，这场革命却使得华侨的政治运动受到了比以往更加严格的限制。人民党革命成功以后，马上在华侨居住率高的曼谷实施义务教育法，对华侨子弟就读的中华学校中文教育课程采取了管制。1933年人民党又颁布了“反共法”。

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后，随着华侨抗日支援运动的不断发展，人民党政权实施了禁止影响对外关系募捐的立法。同时，又以开展扰乱治安秩序的恐怖活动为由，将数千名华侨驱逐出境。1938年底，銮披汶(Luang Phibunsongkhram)就任首相后，对华侨的镇压更是变本加厉。在1935年里，泰国国内尚存250多所华人学校，但在1939年到1940年的这段时间里，所有的华人学校被迫关闭。銮披汶执政期间，除了《中原报》之外，10多家中文报纸全部被停刊。銮披汶政权还高喊“泰国人要掌管商业”，在流通部门由政府出资设立企业。1941年，政府又以治安为理由，在很大的范围内明确地规定出了包括华侨在内的外国人禁止居住区域。对于已定居在此范围内的华侨，则强制他们在90天内退出该地区。此外，政府还以保护本国职业为理由，酝酿制定了多种禁止外国人就劳的工种。尽管当时华侨的生活环境艰险，但自1939年的4月开始，政府首次允许了中国籍的华侨加入泰国国籍。

銮披汶执政期间，一方面力图采取各种手段压迫华侨，另一方面又主动为华侨加入泰籍开辟道路。这背后与其说是因为政府在过多地考虑对日关系的因素，更确切地说，还是由于泰国人的民族主义对本国国内华侨在政治，经济力量上的一种反抗所至。对于銮披汶的这种做法，英国公使也表示出了理解。尽管当时在泰华侨强烈谴责銮披汶政府联日共同排华的政策，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日本要求泰国政府承认其南京政权的合法地位，对此銮披汶一直拖到1942年6月才做出承诺。1941年12月之前，銮披汶保持的基本对外态度是极力不参与日英两国围绕泰国的争论战，采取观望态度。

如上所述，銮披汶政权的华侨政策在1941年12月之前已经确定。日泰同盟关系缔结以后，泰国政府对华侨政策从根本上并无做出大的改变。

銮披汶执政期间，对其强行的华侨同化政策，在泰华人的反应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类。1、以中国人的身分，彻底坚持政治活动斗争，被逐出境或自愿回国的方式支援抗战。2、完全同化于泰国社会。3、一方面在配合泰国政府的同时，也为维护其商人的自身利益，继续保持同日本的贸易往来。另一方面，暗里中进行积极或消极的抗战支援活动。当时支持国民党的大多数指导者都选择了第三种生活方式。以张兰臣等人为代表的指导者既向泰国政府捐款，又响应銮披汶政府新文化运动的号召。为避免在泰华侨立场的进一步恶化，张兰臣向重庆有关方面发电要求对泰国的遣责性广播保持慎重姿势。如此可见，在1941年12月8日日军强行进驻泰国之前，华侨里大多数的指导者已经归顺于泰国政府。这也是日泰同盟后，泰国政府在华侨中寻求对日合作时没有受到过分抵抗的一大原因之所在吧。

本论文是以日军进驻泰国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里华侨的动向为研究对象。据笔者之所见，有关与此的研究可以说尚不存在⁵。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有关上述期间里华侨政治运动的回忆录比较多见。此外在泰国外交部档案处里保存的外交文书，以及在1990年代初期由泰国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泰国国军最高司令部文书(Boko Sungsut)中有关华侨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也都可以利用。本论文在借鉴这些历史资料和报纸杂志等参考资料的同时，基于笔者自己对泰国华侨政治运动史(1941年前)以往的研究，在此对日军进驻泰国后，日泰同盟时期里泰国政府、日军以及在泰华侨的关系进行分析综述。

日泰同盟下，日本和泰国华侨之间的关系与日军在欧美国家殖民地上对华侨的统治方式大为不同。日本和独立的泰国缔结同盟关系后，日本和泰国华侨之间就有了泰国政府的存在。泰国政府对于独立和主权维持抱极端敏感态度，容不下日本当局擅自与华侨间的直接联系。同样，日本也为了确保能得到泰国政府的配合，在处理与华侨之间的问题上采取了较谨慎的态度。事实上，在日军进

⁵ Bruce Reynolds, E于1994年在 *Thailand and Japan's Southern Advance*(《泰国和日本的南方进展》),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94)中利用日本及美国国立公文图书馆的SRDJ历史材料对战争期间的日泰关系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尚未使用存放在泰国外交部，泰国国立公文图书馆以及泰国国会，总理府等地方的大量的第一手泰文参考资料。对此，尽管 Kobkua Suwannathat-Pian, 在 *Thailand's Durable Premier, Phibun through Three Decades 1932-1957*(《泰国的“永久”首相 銮披汶统治下的30年 1932-1957》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中使用了一定的第一手泰文资料，但不得不承认其陈述内容的局限性。除此之外，虽然还存在着很多泰语的硕士毕业论文，但内容深度还有所欠缺。在《日泰同盟下的军事费用交涉 1941-1944》，《东南亚：历史和文化 21》东京 山川出版社 1992年）版 30-64页中，笔者初次尝试使用泰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来对日泰关系做了分析研究。

驻泰国的期间里，诸多有关对华侨政策主动权都是由泰国政府一手掌握，泰国当局在对华侨政策上并没有一一与日本进行商讨。这些政策之中也就难免包括了许多违背想利用泰国华侨的日本方面的利益的措施。泰国政府对华侨的沉重压迫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为此，当时华侨领导者当中也有一部分人试图投靠日本。日泰同盟下的日本、华侨和泰国政府之间的三方关系也就变得极其微妙起来。

对这三方关系产生巨大影响的，就要算是日泰同盟关系的进展情况了。1941年12月21日日泰同盟缔结以后，日本在二战期间通过此条约确保了来自泰国方面的支援和配合。尽管如此，日泰同盟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据笔者调查，日泰同盟下的两者关系可大致划分为以轴心国为主的优势期和守势期两大部分。若将这两大时期再进一步整理的话，每个阶段又可继而划分为两小部分。如此，同盟期的日泰关系就可以从以下四个阶段来进行分析阐述。1、同盟缔结后到1942年的中期。在第一阶段里，泰国对同盟关系怀有很大的期待，全力以赴地满足日方提出的各种要求。2、1942年中期到1943年的5~6月。泰国既没有从日方得到预期的利益回报，而且随着日本在泰国国内利益追求及影响力的增大和权益范围扩张问题的不断升级，泰国对日本的警惕心与日俱增。对日本表现出了一定的冷淡态度。1943年1月，銮披汶预测日泰之间有可能会发生战争冲突。导致泰国在这第二阶段里出现疏远日本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于外部战势的变化，而是出自泰国国内内部。3、1943年6月以后到1944年7月銮披汶下台。随着欧洲及亚洲战势的转变，銮披汶秘密开始着手筹划独自の国防计划。特别是从1943年12月英美对曼谷正式发动轰炸的这个时候开始，銮披汶政府对日不合作的态度变得明显，日泰关系进一步恶化。1944年2月，銮披汶试图联合重庆政府对日发动武装反抗。4、1944年7月到1945年8月。1944年7月銮披汶被迫辞去所有职务。此后，宽·亚派旺(Khwang Aphaiwong)新政权成立，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期间，在本文中作为第四研究阶段对象。在第一，第二阶段时期里，由于銮披汶的独裁专政，导致国会议员中疏远銮披汶的势力不断壮大。这些人以自由泰运动领导人比里·派依荣(Pridi Phanomyong)摄政为核心形成了反銮披汶政权派。1944年7月，由于国会里反銮披汶势力占了绝大多数，加上得不到日军的后援力量，銮披汶被迫下台。宽新政府唯恐日本会通过武力来解决泰国问题，一面着手力图改善日泰关系，另一方面，又在私底下与同盟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銮披汶政权时的华侨压迫政策自此大多被取消了。

本文按照以上划分的四个阶段，对各个时期里带有特征性的日、泰、华侨三者关系进行论述分析。同时，也将对从1941年开始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下抗日活动简单地做一说明。

< 1 > 日泰同盟的成立及亚洲人的“团结”——从屈服到搭便车

1941年12月8日，日本近卫师团从柬埔寨进驻了泰国的中部地区。这期间，岩畔豪雄大校率领的先遣队为了夺取曼谷机场，也于12月9日的早上赶到了Don Muang机场，当天的11点继续向曼谷进军。这支先遣队被命名为曼谷警卫队。12月9日傍晚7时，近卫师团从曼谷亲发命令甲第308号。据此，曼谷警备队的一大任务就是1、监视中华总商会。2、为了对有关重庆系新闻社（《中原报》）报道内容进行革新，向当地机关（大使馆等）提供支援。近卫师团下的其它部队也于12月9日攻入了华富里(Lopburi)、沙拉武里(Saraburi)、巴真武里(Prachinburi)。12月10日，日军控制住了泰国的中部地区⁶。南泰也于12月8日凌晨沦陷到了日军手里。英军方面没有像泰国一部分领导人期望的那样对泰国作出进攻。到12月10日为止，日军实际上已经完全地占领了泰国。

日本大使馆于12月7日夜里10点30分(泰国时间)开始同泰国政府进行和平进驻交涉。銮披汶此时并没有露面。8日凌晨两点左右开始，日军强行登陆泰国南部的6个府和东部边境。日军与泰国军民在此期间发生了激战，仅在南泰地区泰国将校(含警察)就死亡9人，负伤9人，泰国下士官兵死亡140人，负伤119人，百姓死亡人数34人，负伤者也超过了30人以上。日方在登陆宋卡(Songkhla)、北大年(Pattani)的第5师团里战死33人(将校3人，下士官兵30人)，负伤45人⁷。

12月8日7时，銮披汶返回曼谷并于7时30分单方面宣布停战。日方对銮披汶施加压力，据坪上贞二大使回顾，当时的銮披汶在强势面前做出了让步⁸，并在当天的内阁会议召开后的10点半时，答应了日方提出的“日泰两国对日军通过泰国领域内的有关协定”。日本第15军饭田祥二郎司令官

⁶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书《昭和16年(1941)12月8日-12月15日 近卫野炮兵连队泰国进入作战战斗详细报告》。
⁷泰国国立公文书馆(NAT)文件 泰国国军最高司令部文书(Boko Sungsut) 1.10/2, 以及防卫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书《马来上陆作战战斗详细报告同附录附表》。

⁸日本外交史料馆，坪上大使发给东乡外交部长的电文第932号 昭和16年(1941)12月9日。

担任确保泰国安定的重要任务。其目的之一是为了能在对马来亚作战中展开利己的局势，同时也担当着筹备进攻缅甸的任务。饭田祥二郎司令官在12月9日下午3点进入曼谷会见了銮披汶首相。12月10日正午过后，英国远东舰队在马来海的海战中被歼灭。

这一消息随后立即传到了曼谷政府。当日夜里7时，銮披汶表示对于日本提出缔结攻守同盟一事，已在国内开始着手准备。之后，坪上大使要求立即建立同盟关系，銮披汶对此也表示了赞同。这段内容与在11月22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决定的对泰措施要领的内容相符。两国建立同盟关系，泰国为日军提供军事上的合作，日军在尊重泰国独立，主权和名誉的同时，帮助泰国收复丧失的领土。12月11日上午11点20分，銮披汶在“日泰两国同盟条约临时签字书”上签字，并在第二天12日早上的收音机广播中向国民宣布了政策路线的转变。此外，广播局还发表了以下声明。

“政府现公告广大国民，鉴于慎重考虑后，泰国已与日本政府达成同盟条约。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将是符合泰国国家利益的最佳路线。因此，今后日本将是我们的盟友。我们将同甘共苦。”(The Government wish [sic] to inform the people that the Agreement wi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arrived a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t is seemed the best course to be followed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in such circumstances. Hence from now on please rest assured that Japan is Thailand's friend and that together we shall cooperate in enhancing honour.)⁹三菱商社曼谷支店经理新田义实听了这段广播后，当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在强大的攻势面前，泰国政府被迫签下了同盟条约。200年后一切恩怨的结果又将会变得如何，这就要完全取决于日方对泰国的所作所为了。”

12月13日(据泰国方面的公文记载材料是12月14日)，日泰两国就共同作战对抗缅甸敌军一事签订了“日泰协同作战纲要”。在日军进驻东泰巴真武里(Prachinburi)之前，集结在当地的泰国陆军精锐部队在13日夜里被命令向北泰进军¹⁰。这些部队在12月24日里，被正式编为远征缅甸掸邦(Shan States)的西北军。(贡塔普·帕亚普 Kongthap Phayap) 在日泰关系的紧要时刻，銮披汶的心腹普拉永·帕梦蒙特里(Prayun Phamonmontri)大校于12月14日召集了对日关系的委员聚集一堂，对于政府由中立突变为同盟的态度转变如此作了一番解释。“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就如天崩地裂一般。为了避免遭到不幸，还是要见机行事。既然日本的许多要求都是十万火急，我们也就无需拿出什么法律和规则。如果惹得日本不愉快，那今后恐怕我们就要断子绝孙¹¹。”12月15日，内务部长将各部厅代表召集一堂，要求大家以书面形式确保严格执行銮披汶首相的政策¹²。

两国于12月21日在“日泰同盟条约”上签字使其生效。按此同盟条约所规定，泰国对日本提供“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一切相关的支援”。在本条约的附属秘密谅解项目中，也有“在泰国提出要求收复其沦丧领土的时候，日本应该给予协助。”的规定。同盟关系确立以后，銮披汶首相12月22日致电给驻德国公使，“我方自愿与日本签署条约。现在泰国欲加入轴心国。请与德国政界官员取得联系，探听一下德方对此的真实态度和意见。”(This pact has been concluded by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of its own accord.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is now about to join the Axis. Please get in touch with German political quarters and find out what they really feel and think concerning us.) 对此，驻德公使在12月30日的回电中汇报了德国的反应。“德方有意让泰国加入轴心国，但考虑到日本方面的因素，认为为时过早。德方等待日本先提出此事。”銮披汶在收到消息后，指示部下对驻德公使作出如下答复。“电文已收。深表感谢。我方与日本同结为一体。”此后，在1月25日泰国对英美宣战后，2月3日，銮威集哇他干(Luang Wichitwathakan)外交副部长又电令给驻日泰国大使里绿(Direk Chaiyanam)命令其试探一下日方对泰参加轴心国的意见¹³。通过这些电文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泰国在对同盟关系问题的看法上有了相当大的转变。换言之，日泰同盟的缔结，并非只是因为泰国受到了日本的强迫，这当中也有来自泰国方面自发性想要缔结同盟的因素。而且如上所示，泰国当时还有意欲加入三国轴心国的同盟之中¹⁴。

⁹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 WW2/2:16/5。

¹⁰ NAT, Boko Sungsut 1.5/13。

¹¹ NAT, (2) SoRo. 0201. 98. 1/2。

¹² NAT, (2) SoRo. 0201. 98. 1/3。

¹³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 WW2/1:2/3, WW2/1:8/4。

¹⁴ 1940年11月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加入了1940年9月27日缔结的三国同盟。銮披汶从战争期间的1943年开始就反复为自己辩解说缔结日泰同盟是为了维护独立而不得不采取的方式(详见 NAT, Boko Sungsut 2.7.6/31)。这个时期的日泰关系极度恶化。一直到战后为止，銮披汶依然坚持自己的上述辩解，反而只字不提他从主观上缔结日泰同盟的愿望。

銮披汶在由对日英关系保持观望态度到采取政策方针路线转变的同时，也变成了鼓吹亚洲主义的倡导者。泰国期望日本所提倡的亚洲人共同利益的确定会符合泰国的利益，趁机也可搭乘日本的便车。12月22日銮披汶致电蒋介石，（电报内容没被传到，却在12月25日的国营短波电台上被播放）在文中表示日泰同盟的建立并非是受到了日本的强迫，而单纯是自己主观上的想法。并呼吁日中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不小的灾难，正因为如此，为了亚洲人民的进步，应该采取对日和平态度。銮披汶还谈到泰国人民已经对日泰同盟表示同意，日本是一个有德望而且非常善良的亚洲民族。现在缅甸和印度已经在逐步认识到这一点。“亚洲属于亚洲人自己”这句话时常可以听到。泰国要求中国也加入到这个队伍里来¹⁵。

12月23日在曼谷的印度人召开了争取独立的集会。以斯瓦米·萨太雅那达·普里(Swami Satyananda Puri)为首的印度独立联盟(Khana Ku Issaraphap India、Azad Hind Sangh)在这次集会上一次就召集到了300名入会者¹⁶。24日，在曼谷国立剧场又有100多人参加了缅甸人举行的大会銮威集外交副部长也出席了当天的这场集会。最后，在曼谷周边的三四百名缅甸人以蒙伦派(Mong Lunphe，以后成为缅甸独立义勇军的少校)为首自发成立了义勇军。銮披汶给这两次集会发出了贺电¹⁷。

銮披汶由以往的对日消极态度一转为积极配合日本的态度。对在马来亚和缅甸作战中的日军，泰国在铁道运输，道路建设，物资供应，宣传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配合。当然，泰国这样的做法里也有其自身的“小算盘”。正如1942年1月1日，銮披汶的心腹卡衣·普拉提帕森(Chai Prathipasen)中校于在召集与日本进行联络的官员的讲话中所谈到，“对于日军方面的要求，我们自然应该全力以赴加以支持，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不可损害自己的利益。我们帮助日本，但既不是日本的差使也不是他们的奴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想让别人为自己做事，那我们就先投入一定的“资本”。今天我们在此帮助日本，今后我们就可以从中获益¹⁸。”1942年1月25日，泰国对英美发出宣战。据此，泰国就可堂堂正正地远征英国统治下的缅甸了¹⁹。銮披汶对此非常关注。1942年1月，日军在清迈(Chiang Mai)，喃奔(Lampun)等北泰各地，以泰籍的缅甸掸邦人为对象召开集会，募集对缅作战的义勇军。日军的强行征集方式引起了泰国地方官僚和日军之间的纠纷。得知此消息后的銮披汶指示担当对日联络的卡衣(Chai)中校说：“如果日本想要招兵买马的话，就让他们直接来告诉我好了。他们可以动用我们的正规军²⁰。”

由于泰国政府改变了既往的方针路线，积极配合日本，使得在曼谷的日军得以顺利实施其华侨政策。关于日军对泰华侨政策的基本方针，我们可以从当时日本陆军作战方案制定的担当者参谋总部第一部长田中新在1941年10月27日的工作日记第7项，对华侨政策的记述中了解到一些情况。其内容的第3条：“仍旧保留华侨组织，从大局出发，力图使广大华侨支持南京政府”。第4条：“利用华侨的结合力，商业才干，积聚钱财之心，使其效劳于我国家的利益”。第5条：“通过满足华侨需求的方式，来争取华侨的更积极配合”。第7条：“将印度支那和泰国的华侨工作情况作为一个“反应显示计”如此统治方式会取得成功的话，在其它地区也应该可以试行”。在以上几点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本有意利用华侨。

日本在泰国的华侨工作由驻泰日本大使馆华侨组来担当，陆军武官作为其顾问在政治，经济，宣传等多个方面进行指导²¹。由此，可想到在前文中所提到的12月9日进驻曼谷的曼谷警卫队正是陆军武官田村浩为执行日本对华侨政策而加以利用的部队。田村在1941年12月9日的备忘录中列出了几个应该压制的敌对派团体名称。其中有“中国人运动团体，三民主义青年团，蓝衣社”²²。当然，从重庆派来的抗日工作人员所领导的一些团体也受到了日军宪兵队的镇压。对日军的这些擅自做法，銮披汶首相颇感不快。1942年1月9日，銮披汶托田村武官捎口信给东条首相说“泰国

¹⁵ Prachachat 29 Dec. 1941.

¹⁶ NAT, (2) SoRo. 0201. 10/50. 就印度独立联盟的阿马拉辛在对印度，马来亚和泰国的印度人进行宣传广播一事，日本陆军武官向泰国政府请求给予协助。为此，从1942年1月7日开始每周两次，星期三和星期日的早上8点开始，得以进行30分钟的广播宣传(NAT, Boko Sungsut 1/50)。

¹⁷ NAT, Boko Sungsut1/238. 蒙伦派在这以后以每个月200泰铢的报酬为日本的间谍机构(楠本机关)窃取泰国的情报。据悉当时也确实有和其同名同姓的一位眼科医生。(NAT, (2) SoRo. 0201. 98. 1/10. 以及1990年3月5日对小田正身(楠本机关长)的采访。

¹⁸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 WW2/2:2/2。

¹⁹对英国的宣战有可能是为其对外征伐作准备。

²⁰ NAT, Boko Sungsut 1. 12/69.

²¹海南海军特务部政务局第一调查室《兴发公司“泰国华侨工作机关”》昭和(1942年)17年8月。

²²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书《泰国关系、田村武官笔记 其一》。

有自己的华侨政策，我们希望日方能给予协助。当然我们是不会允许华侨做出有损贵国利益的事情²³。”

正如这样，銮披汶时刻不忘在华侨问题上叮嘱日方。开战后，由于銮披汶高喊“亚州属于亚洲人自己”，日本的华侨政策得到了很顺利的实施。

日军进入泰国后，华侨的领导者们纷纷转移到了地下。一部分领导人试图从泰国北部逃亡到国外去，但由于日军采取了及时迅速的封锁活动而未能得以实现。日方意图保留利用华侨组织，着手重建中华总商会，但主席张兰臣却迟迟不肯露面。日本接触前任主席陈守明，想让他代替张兰臣出任主席，但陈氏以自己并非现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为由断然拒绝。最后，日本接受日本商业干旋所所长田中的推荐，委任朱兆山为临时主席²⁴。朱兆山随后在1941年12月25日与总商会的执行委员云竹亭、赖渠岱、陈振敬、陈绎如、陈镛将等华侨领导者和亲日派的中心人物无特定工作的部长瓦尼特·帕纳依(Wanit Pananon)一起拜访了銮披汶首相。他们在问候中即向銮披汶表示，为驱除英美势力，在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泰的广大华侨对泰国政府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这一明智举动深表支持。中华总商会认为泰国与日本缔结同盟，共同建立东亚新秩序既符合在泰华侨的利益，也符合全亚洲人民的利益。泰国华侨衷心感谢泰国政府对华侨的保护。总商会以泰国全体华侨的名义向政府深表谢意的同时，也表示将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为将口号付诸于行动，朱兆山等人又当场表示将在近期内组织召开旅泰全体华侨大会²⁵。12月28日下午两点，在中华总商会里由1万多名的华侨以及日本大使馆官员，日本军人，印度独立联盟代表等人参加的旅泰全体华侨大会正式召开。首先由张兰臣中华总商会主席出场致开幕词，接下来是瓦尼特(Wanit)代表銮披汶首相致词。紧接着，围绕着泰国政府的政策以及日本推行的东亚新秩序的建立，张兰臣主席和六属会馆(潮州，客属，琼州，广肇，福建，江浙)的代表也分别表示将配合泰国和日本两方政府²⁶。大会最终决定了对泰国现行国策的拥护，共同努力建设东亚新秩序，由中华总商会及六属会馆实施对泰国政府的募捐活动内容。到1942年2月25日为止，共收到捐款13万1128.5泰铢。当日这笔钱就由瓦尼特转交给了銮披汶首相²⁷。

中华总商会和六属会馆是在泰广大华侨的代表组织，因此他们的集会也都是以旅泰全体华侨大会为名义进行活动。1942年的1月2日，中华总商会和六属会馆联名致电给南京汪精卫国民政府。(内容在短波电台中被播放)其具体内容是，泰国对日本帝国政府赶走英美的压迫统治，解放全体亚洲人民的行动表示赞同，并与其缔结了同盟关系。日军进入泰国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广大华侨对此表示感谢，同时召开旅泰全体华侨大会，决议一致拥护泰国协助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政策。阁下也放眼于救国救民的国策，积极配合日本政府，大多数的国民安全得到保障，我们对此深表敬佩，也深信贵政府会得到全体华侨的支持。此外，中华总商会也致电给蒋介石重庆政府，请求蒋政府协助将英美国从东亚驱除出去，一起建立新秩序²⁸。2月18日，日军正式进驻新加坡当天，中华总商会要求华侨升中日泰三国国旗以示庆祝，并特地注明中国的国旗是指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²⁹。日泰同盟的缔结以后，从表面上看，泰国华侨除了支持南京政府以外就变得别无选择了。

就这样，随着日泰之间共同合作方针的实现，战前开始就对泰国政府表示出顺从态度的华侨很自然地也就表明要支持日泰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目标。日本由于得到了泰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对泰华侨工作上，即便说只是表面现象，但还是很轻易地获得了领导性华侨团体的配合。而且，日本也轻易地让当时唯一一家泰国政府认可的中文报纸《中原报》进行了版面革新。《中原报》创刊于1939年初，当时是由抗日运动一大中心派的潮州会馆派小组领导者蚁光炎、陈景川、廖公圃、余子亮等人为主要办刊者。日军进驻曼谷后，这些相关人士也就变得不见踪影，报纸也为此自然停刊了。日本大使馆通过律师联系到了隐藏着的余子亮³⁰，并得到了蚁光炎的后代蚁美厚的支持³¹，买

²³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书《泰国关系、田村武官笔记 其三》。

²⁴《中原报》1942年1月20日。

²⁵*Prachachat* 27 Dec. 1941, NAT, SoBo. 9. 2. 3/4.

²⁶*Thai Mai* 30 Dec. 1941.

²⁷《中原报》1942年2月5日, 2月26日。

²⁸*Prachachat* 5 Jan. 1942.

²⁹《中原报》1942年2月18日。

³⁰藤岛健一著《动荡战争下的秘闻史〈自我回忆录〉》曼谷 国际印刷 1977年 126-127页。

³¹稻领一郎著《稻领一郎回想录、以世界为大舞台》冲绳 times 1988年 189-191页。

蚁美厚(作为战后回归华侨在全国侨联历任副主席)是1939年11月里被暗杀的抗日运动领导人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的后代,日军进入泰国后立即派宪兵队对其进行追捕。蚁美厚随即向满洲铁路曼谷事务所所长稻领一郎发出请求,之后在稻领一郎家中藏身了一个月之久。

下了中原报社。日本又对潮州会馆主席陈景川以及对华侨社会极有影响力的赖渠岱等人施加压力，通过他们劝说以往报社里的记者和工作人员重返旧职³²。日方任命张兰臣为该报的社长(1942年5月末为止)，同时大使馆也派遣了藤岛健一负责编辑。泰国国立图书馆现保存着从1942年1月19日起改版后的《中原报》。据此，我们也可以想像出《中原报》正是在这个时期里进行再版的吧。日本掌握了泰国政府唯一认可的一家中文报纸，实际上也是控制了对广大华侨的舆论内容。

对于日本的华侨政策工作，在泰华侨并没有做出很明显的反抗。日本宪兵队镇压以及逮捕华侨的事件也是极为少数。(当时的林部队(第15军)宪兵队在以后的1942年3月里被合并到南方军所属的宪兵队之下，合并后的宪兵队覆盖了泰国全境。)1942年日本宪兵队，泰国宪兵队和泰国警察队三者之间签署了“有关日泰警务联络会议的规章”。其主旨是“基于日泰同盟的宗旨，为了日军和泰国的共同利益，日泰双方保持相互联络，相互合作，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共同发挥效果。”

“基于泰国的法律，在处理警务问题上(除敌对派人士以外)的对象范围，日本宪兵队必须在通过泰国宪兵队以后，再与泰国警察机关来共同作出处理决定。”此外，1942年10月7日，日军宪兵队长和泰国军的日泰政府联络所(担当联络日泰两军的泰国军机关)之间就日泰双方共同执行处理泰国人及华侨的偷盗问题，间谍活动问题等事作了再度确认³³。按原则上来说，日军在实施具体问题上须和泰国方面一同携手处理。日军和泰国人及华侨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醉酒，无证驾车，暴行拷问等事件都被分别归类，一一记载在了“日泰共同军事警务简要录”(Concise report of the joint Thai-Japanese military police)里面。这些大量的材料记载了战争中的整个过程，而且一直被保存到今天³⁴。对于日军宪兵无视日泰双方间既有的协议，擅自出兵逮捕重庆系的华侨(当中也有许多泰国籍华人)和抗日印度人，泰国方面每次都提出了抗议³⁵。对当时逮捕间谍及盗窃日本军用物资的事件也有详细的记录。例如，在1942年底泰国外交部就抗议日军擅自拷问泰国人及华侨一事，在提交给日本大使馆的一览表中记载着，在曼谷有遭到日军宪兵队拷问嫌疑的案件有22起，地方为26起。就曼谷的22桩记载事件来看，泰国也参与的逮捕事件有8起，其余的全部为日军的单独行动。具体内容如下：嫌疑逮捕犯中，重庆间谍逮捕事件6起(中国籍14人，泰国籍1人)，逮捕偷盗日本石油等军事物资案件11起(中国籍5人，泰国籍27人)，伤害嫌疑逮捕案件1起(中国籍7人，泰国籍2人)，不明案件4起(中国籍4人，泰国籍2人³⁶)。在逮捕的重庆间谍嫌疑犯中，大多数是从重庆政府的戴笠将军侍从室派出来的间谍组织(泰国工作组)的人。这个机关部门的干部是以原中国国民党泰国总支部长萧佛成的儿子萧松琴为首，萧松琴的妻子周秀兰、蓝东海等人也是此机关的干部。萧松琴大概是在1941年的10月10日离开了泰国前往重庆³⁷，而蓝东海在1941年的11月经新加坡进入了泰国。这个组织通过无线发报来探听日本宪兵队的情报。但在1942年9月28日却被一举揭发。几天后，日军宪兵队也逮捕了萧松琴(萧松琴的兄长)的儿子萨尼提·西布鲁安(Sanithi Sribunruang)，但周秀兰和蓝东海却逃脱了这次逮捕³⁸。据说，日本抓获了重庆方面的中尉通信员并将其作为二重间谍留驻在曼谷，一直到1945年的3月左右为止继续窃取重庆方面的情报³⁹。

重庆政府对泰国的工作机关除此以外，在重庆当地还存在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于1942年任命的海外部泰国特派员(邢森州中将)的机关⁴⁰。另外还有，最迟于1943年年初成立的，作为军队机关的军事委员会泰国军事专员公署(卓献书专员)将总部设于云南的景洪。同盟国将泰国作为中国战区的一部分，是此公署成立的原因。这家公署既帮助自由泰成员潜入泰国国内，又向泰国国内输送敌后工作人员⁴¹。

³²林僧《四十年底事今朝诉——忍辱负重搞〈伪报〉》，新中原报《从中原报到新中原报1938-1988》曼谷1988年5页。

³³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WW2/2:11/20, WW2/2:2/5。

³⁴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WW2/2:4/4。

³⁵例如，1942年的12月15日清晨，一组60人的日军宪兵队单独行动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名逮捕了印度独立联盟反日派的10名人士(西瓦拉姆，拉马强，阿马拉信等人)(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WW2/2:2/6)。

³⁶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WW2/2:1/20, WW2/2:2/5。

³⁷《泰华商报》1945年11月19日。

³⁸蓝东海先生的采访(1992年7月9日)。对于这次逮捕，中村明人在《神圣的司令官、驻泰回想录》(东京日本周报社1958年)的第119-120页中有所记述。蓝东海先生在读了该书的泰语版本后(曼谷1991年版村岛英治译)于1992年8月26日在《世界日报》(曼谷)上刊登了对当年被捕时的回忆录。关于萨尼提被捕一事详见下述资料。NAT, (2)SoRo. 0201. 98. 1/1。

³⁹中村明人《神圣的司令官、驻泰回想录》中，有一部分记述与事实有出入。笔者基于泰国方面的资料(NAT, Boko Sungsut 2. 7. 4/86)，对此进行了一定的修正。

⁴⁰《中原报》1946年1月8日、《泰华商报》1945年10月8日。

⁴¹泰国黄埔校友会编辑委员会《铁血雄风、泰国华侨抗日实录》曼谷泰国留华同学会1991年。该书是由多位参加过暹

从上述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方逮捕的华侨可谓寥寥无几。即便从战后的报道来看，被日军宪兵队检举的华侨数也不超过 300 人而已⁴²。1942 年 1 月 17 日，以陈景川潮州会馆主席，廖公圃等著名华侨领导者和泰国人记者被捕后，多数人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号称“五君子被捕事件”在泰华侨中反响颇大。这一闻名事件在泰国国内被称为“泰国自由团 (Thai Issara) 事件”。一般都认为这桩事件是日军对华侨的一次镇压。举例来说，1946 年 2 月 14 日，潮州会馆在给战后获得释放出狱的 5 位人士召开慰劳出狱狱友联欢大会时，《中原报》报道说：因秘密主持抗日救国工作而遭日寇帮奎披汶政府拘捕入狱，这一事件…为暹罗华侨抗日救国史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⁴³。但泰国政府方面的资料却表明这次逮捕事件与日本毫不相关⁴⁴。而且，日方当时正在利用陈景川等人。此外，在泰国人中间发生的泰国自由团事件，笔者认为奎披汶为镇压对其反对势力的必然结果。泰国警方以叛乱罪的名义悬赏捉拿在这个时候逃脱了逮捕后潜入地下工作的《中原报》原编辑长李其雄⁴⁵。战后李其雄和周秀兰成了汉奸追踪的中心人物⁴⁶。

日本的初期华侨政策没有受到华侨们的抵抗所以进展顺利。在中华总商会的改选之际，日本欲使担任重庆政府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要职、在泰华侨领导人中的蒋介石派代表、原中华总商会主席的陈守明重返主席职位。陈守明在 1942 年 3 月 10 日经过执行委员会的互相选举被推选为主席后，却又坚决推辞就任。尽管此后，受不住执行委员会的再三挽留，陈守明还是就任了此职⁴⁷。但战争结束时陈守明就被暗杀了。尽管直到今天陈守明的暗杀事件还是没有个水落石出的结果，但在 1945 年 11 月，潘子明汇报给戴笠军统局长的文件中有记录说，陈守明曾接到过印有国民党章印向其索要 5 万泰铢的恐吓书。通过此事，不能排除国民党中的一部分也与此次暗杀事件有所瓜葛的可能性。另外，一部分华侨中也流传着是共产党以汉奸为由将陈氏暗杀了的说法。在陈守明的葬礼上，出版了一些纪念性的书籍。关于陈氏就任中华总商会一事也有这样的记载。“日军一直清楚获得泰国华侨配合支援对其自身所意味的重要性，为此日军认为陈守明是对华侨商人最具说服力的合适人选。当时正值中华总商会的改选时期，日军努力想促使陈守明重返主席职位，但陈守明却以各种理由作了拒绝。最后日方表示，如果陈守明不担任主席一职，就表明泰国华侨对日本不合作，为此日军也将重新考虑对华侨的政策，同时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如果事态发生到这种地步的话，广大华侨将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陈守明为了华侨的利益，不得不违心地接受了此职⁴⁸。”

泰国屈服在日本强大势力面前的事实就摆在眼前，这使得长期以来受泰国政府压迫的华侨中间就出现了一部分人试图通过接近日本来躲避泰国政府的压迫。泰国外交部副部长奎威集和外交顾问旺·外塔亚孔亲王 (Prince Wan Waithayakon) 在 1942 年 3 月 20 日提交给奎披汶首相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公文里就对此有所阐述，并指出了这种现象对泰国今后的危险影响⁴⁹。1942 年 4 月 28 日，泰国外交部东洋政治司长的韦斯特·阿塔尤库 (Wisut Atthayuk) 在与日泰政府联络所的皮西特蒂萨蓬·蒂莎昆亲王 (Prince Phisitdisaphong Disakun, 达姆亲王 Prince Damrong 的儿子，以下简称皮西特) 中校会谈时，皮西特谈了如下自身的想法。“日本的做法简直就是骑在我们的头上来讨好华侨。这就好像是说，华侨受了我们的委屈后请来了日本人一般。听说中华总商会的主席对日军更是百般听从，却对我政府摆出一副冷漠的态度。为了让华侨了解到泰国政府对华侨并不怀有恶意，我们就应该与中华总商会主席保持更密切的联系⁵⁰。” 最后还穿插补充说韦斯特也很同意这个分析见解。这些内容都记录在了 4 月 28 日上述二者的会晤录里。韦斯特将以上谈话内容记录在公文，

罗军事专员公署工作的人基于各自的回顾编辑而成。由于多为回忆内容，诸多记载活动的具体年月日不详。

⁴² 1945 年 10 月 9 日和 17 日，由国民党抗日指导者周秀兰女士带领的华侨对宪兵和相关者 800 人的首级进行了对证，并当场指出了虐待华侨的 11 人（《中原报》1945 年 10 月 10 日、10 月 16 日、10 月 18 日）。

⁴³ 《中原报》1946 年 2 月 15 日。

⁴⁴ NAT, Boko Sungsut 2.7.2/2, 2.10/10。此外，据美国破解的 1942 年 6 月 11 日，驻泰国的日本大使馆在发给外务大臣的第 1173 号电报（美国国立公文文件馆 SRDJ Box 28 23868 页）内容，笔者判断日方对这次逮捕的确一无所知。再者，如本文中所述，陈景川当时也顺从日方，在多方面给予日本大力协助。尽管在战后处理汉奸的问题上，陈景川又作为不配合日本的代表模范，但正如当时报纸所述：“陈景川先生就是当时潮州会馆主席，亦曾于日军占据暹罗后之某日，首次向日本政府及南京伪府通电者”。由此，可以说在华侨领导者中很难找出当时真正没有给予日本提供帮助的人（《泰华商报》1945 年 10 月 12 日）。这也是后来引起了很大争议的一个话题。

⁴⁵ *Prachachat* 12 April 1942。

⁴⁶ 比如，这两人批判华侨的中心组织六属会馆为“日本傀儡的伪组织”（《全民报》1945 年 10 月 17 日）。此外，据报导，战争结束时，战时的华侨领导者纷纷逃亡时的样子比日军进攻泰国时还要恐惧不安（《泰华商报》1945 年 10 月 12 日）。

⁴⁷ 《中原报》1942 年 3 月 24 日、4 月 4 日。

⁴⁸ 《陈守明葬式本》（泰语版）曼谷、1954 年。

⁴⁹ NAT, (2) SoRo. 0201. 77/2。

⁵⁰ 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WW2/2:2/2。

提交给外交部部长。此外，在华人聚居的曼谷桑潘塔旺县(Samphanthawong)里，由于泰国政府在日本的要求下，4月21日开始贬值泰铢使其与日元降低到同一汇率，这就引起了当地华人的恐慌，大家纷纷认为泰国政府将沦落到日本手中，亲日冷泰的问题也就油然而生。曼谷知事在接到桑潘塔旺县长的汇报后，又将此内容于1942年的4月27日在公文中提交给了内务部长⁵¹。

开战初期，不仅日本在东南亚的战场上取得了主导控制地位，其欧洲的轴心盟国也在战争中趋于优势。当时泰国领导者认为，日本在东南亚战区的优势地位今后比较长一段时期也将持续下去。泰国这个时候将本国的战略目标定在既要防止日本在泰国境内影响力的过分增大，又要不失时机地借助于日本不断壮大的势力，以实现本国领土的扩张，文化上对他国的渗透，最终使泰国成为东南亚的中心国家。我们可以通过銮披汶以及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銮威集(6月19日提升为外交部长)的一些讲话记录中了解到这类情况。比如说，1942年5月日本提议建立文化协定，对此，銮威集又进一步提出说，文化协定不应该只建立在日泰两国之间，泰国应该成为“南亚的文化中心”⁵²。对于泰缅铁路建设一事，1942年6月11日銮披汶表示“由日本方面出面建设也可以，但泰国要随其在后面进行文化上的广泛宣传。这也是作为同盟国应尽的义务⁵³。”在1942年7月31日的文献记载中，銮披汶听说日本农学者视察了曼谷附近的农业试验基地以后，又强调说：“日本似乎在打算从泰国学习农业以及其他方面的技术，我们必须立刻动手在栽培，牧畜等多个方面走到最前端，起到带动整个亚洲人民的中心作用⁵⁴。”

带着这些想法的銮披汶欲借助于日泰同盟关系来扩张本国领土，积极对外派兵远征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日本方面为了支持銮披汶政权，虽说最终还是容许了泰国的出兵远征，但这并不是轻易就达成的协定。日本南方总军一味认为泰国政府是屈服给了日本，所以当泰国提出要求派遣远征军的时候，日本南方总军就回应，要求泰国首先对其武力反抗行为进行赔罪⁵⁵。同时，日本政府也要求泰国承认其在南京政府的地位。1942年5月5日，日泰两国签署了“关于日泰两军共同作战追加协定”以后，泰军迈出国境，向着萨尔温江(Salween R)东部的掸邦出征。泰军将重庆军队驱逐出掸邦以后成功地占领了此地区。对于这片领土的归属问题，在1942年6月30日日本陆军大臣下发给冈部队(南方总军)总参谋长的指示文中，有如此记录。“对于泰方的这次行动，我们要尽量避免明确表示这是泰国收回了丧失的领土。我们要依照泰国对我们的效劳程度来做出反应。所以对泰一定要慎重发言⁵⁶”。对于泰国借机利用日本在东南亚地区不断发展的势力来壮大自己的企图，日方并没有对此抱以太多的顾虑。

< 2 > 日泰关系的冷却及华侨问题

日泰关系从1942年后半时期开始出现急速冷淡。在坪上贞二大使于1942年8月4日发给东乡外务大臣的第1657号电报上，坪上大使报告：如实说，目前在泰国并没有纯粹的亲日派。特别是在少壮派当中，对泰国过度依附于日本这件事情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呈多数。现在泰国国内的反日情绪也比较高涨。分析泰国要人的见解知其主要原因有：1、日本商社在军事力量背景下进行经济侵略。2、日本军队无视泰国内法令肆意侮辱泰国官民。3、日本干涉泰国内政。4、日本不向泰国交付在泰的敌对性资产。5、日本以占领地或者殖民地的方式对待泰国等等⁵⁷。由于篇幅有限，在此就不详细地列出泰国方面的资料进行评论，但前面的反日原因和泰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是一致的。日本与泰国签署了同盟条约，泰国出兵进攻了掸邦以后，日本却迟迟没有提起领土归属问题，这恐怕也引起了銮披汶的不满。

銮披汶为了防止日本会带来的损失，在中央政府各部厅及各地地方政府中设置了对外关系委员会并于1942年5月13日下令，定期召开对外关系委员会会议，监督外国人(日本人：笔者之所见)是否有妨碍影响泰国人利益的行为，以及单方面获取利益或者有可能为泰国带来的损失，寻求防范办法，并把结果转告首相的措施⁵⁸。可是1942年中期，銮披汶在日本强大的势力面前，努力避免日泰关系出现决定性的恶化。

⁵¹ NAT, Boko Sungsut 1/143.

⁵² NAT, WW2/2:4/1.

⁵³ NAT, Boko Sungsut 2.4.1.2/1.

⁵⁴ NAT, (2) SoRo. 0201. 98/9.

⁵⁵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书、荒尾兴功《南方总军的统帅(进攻作战期)》。

⁵⁶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书、《占领地行政关系册》。

⁵⁷ 日本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馆长符号来电册。

⁵⁸ 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WW2/1:21/1.

当时，泰国政府一直对日本的掠夺行为耿耿于怀。体现日、泰、华侨之间关系代表性的是 1943 年 1 月划定北泰六府为禁区的事件在这次划定禁区的过程中，銮披汶当时意将日本人与华侨同划为外国人类别一起排除出去。

1943 年 1 月 14 日，在北泰和泰国西北军占领地视察的銮披汶向自己在曼谷的心腹銮亚仑 (Adun) 警察司长授意，让他下令在喃邦 (Lampang)、清迈 (Chiang Mai)、昌来 (Chiang Rai)，杼 (Phrae)、喃奔 (Lampun)、程逸 (Uttradit) 的外国人必须于一月底之前离开当地⁵⁹。亚仑依据国家防卫预备授权法 (1941 年 12 月 6 日公布) 于 1943 年 1 月 20 日公布了 20 天内外国人必须从六府离开的法令⁶⁰。此法令是以万磅 (Bang Pong) 事件 (1942 年 12 月 18 日发生) 为契机，紧随在 1942 年 12 月 28 日公布的华侨从干乍那武里 (Kanchanaburi) 以及叻丕府 (Rachaburi) 万磅县撤出命令 (其对象有 7000 名华侨，理由是华侨散布“泰国人对日本人持有恶意”的言论，破坏日泰关系) 后的产物⁶¹。从北泰六府退出的华侨多达数万人，但日本人却只有数十人。很多华侨在北泰经营着火磨 (碾米厂)，火锯 (锯木厂)，他们撤出后给农民和消费者以及驻扎在北泰的西北军都带来了很大的不便。銮披汶于 1 月 27 日在曼谷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提出了由泰国粮食公司代替华侨从事火磨经营的方针⁶²。

1943 年 2 月 7 日，从掸邦回到清迈府的銮披汶看到尽管发布了外国人退去命令，但还有日本人留驻，于是向曼谷的亚仑训示“日本人还没有撤出，命你尽快通过外交部向日本驻泰大使传令，日本人也必须像其他外国人一样遵守泰国的法令。若不遵行的话，将被视为日本人无视泰国法令，泰国主权未被尊重。我听说其他外国人离开后，日本人带入大量金钱，准备大肆做生意。如果这样的话最好让华侨和印度人留下来和日本人竞争。你命令清迈府知事，驱逐日本人出境。日本人若不同意则让他们与华侨印侨一起竞争。其它的府没有此类问题⁶³。”之后于 2 月 10 日又发令“内务部长及外交部长，现在北泰各个府的外国人都已撤出，只有日本人没有遵守。你们去日本驻泰大使馆，向他们要求日本人也要像其他外国人一样撤出。即使有例外也要尽力缩小到最低限度⁶⁴。”銮披汶认为华侨和日本商人都对泰国利益构成了危害，因而也积极努力地排挤日本人。

銮披汶于 1943 年 1 月 22 日发布了有关将西北军占领地的称呼，由英国当时的“掸邦联邦 (Federated Shan States)”改为“原始泰联邦”的最高司令部布告⁶⁵。进而在第二天的 23 日里发令建立征用 1 万 5 千泰国人组成的掸邦州内道路建设师团，并下令道路司终止一切国内其它道路的建设，将器材在 4 个月以内运至掸邦支援道路建设。从前一年的 9 月 17 日起，銮披汶已经下令进行开工，却迟迟没有进展，因而自己亲临现场进行监督。銮披汶十分重视这项工程，认为“这条公路的建设将关系到泰国的存亡”，并严令如无法限期完成将对建设负责人进行军法处置⁶⁶。据笔者所见，由于銮披汶为了统治掸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日本却并没有围绕领土问题给与銮披汶满意的答复，为此，銮披汶极为气愤。由此笔者判断，至此銮披汶的认识产生变化，他不再考虑借助于日本，而是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统治其占领地的掸邦。銮披汶在收复领土问题上一直采取高度重视的态度。1943 年 4 月 8 日帕伊梭头 (Phairot Chaiyanam) 宣传司长呈报銮披汶，据在缅甸的情报人员汇报，缅甸有意让日本将掸邦归属于自己统治。銮披汶知道后表示“明白。转告外交部，(如果缅甸想要掸邦)，如果得不到掸邦的话，我们就要获取缅甸的南方领土⁶⁷。”

这时期銮披汶对华侨进行一系列迫害的事件里，和北泰驱逐令齐名的是向泰缅铁道建设强制提供大半的华侨劳动力。

1943 年 3 月 2 日，日本陆军武官在泰陆武第 37 号中写道，“日本陆军为促进连接泰缅的铁路建设，火速请求全力征集下文中所列有关人员和器材的供应。”以此向日泰政府联络所长索求总数为 1 万 3000 人的苦力 (包含挖土工 1 万 1350 人) 以及苦力所使用的建筑器材。之后泰军的负责人从日本武官处了解到详细的情况后，向内务部的福利司要求募集泰国人做苦力。该计划意图是以泰国人为主，如果不足再由华侨来作补充。这似乎是因为负责方考虑到前年 12 月 28 日在泰缅铁道建设区域中的干乍那武里 (Kanchanaburi) 已实行过对华侨的驱逐令，如要加入华侨苦力就得采取例外

⁵⁹ NAT, Boko Sungsut 1/303.

⁶⁰ NAT, Boko Sungsut 1/309.

⁶¹ 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 WW2/2:2/5.

⁶² NAT, Boko Sungsut 1/339, 341.

⁶³ NAT, Boko Sungsut 1.16/84.

⁶⁴ NAT, (2) SoRo. 0201. 76/14.

⁶⁵ NAT, Boko Sungsut 1/332.

⁶⁶ NAT, Boko Sungsut 1/330, 331, 335, 345.1.7/14.

⁶⁷ NAT, (2) SoRo. 0201. 98. 1/10.

措施，而如此一来又将与奎披汶的命令相违背。可是，这个计划上报给奎披汶后，3月24日奎披汶却做出了“可以使用华侨和外国人，不必让泰国人去”的强制措施⁶⁸。他在3月25日向负责强制征集的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授意：“我们已经强制征用了干乍那武里府、叻丕府(Rachaburi)、佛丕府(Phetburi)的很多本国人去建设军用铁路了，这给当地泰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长久以来华侨和泰国人同甘共苦，在泰国国内安居乐业。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向华侨寻求帮助也是很自然的，所以军用铁路的建设可以采用大量强制征集华侨的方式⁶⁹。”就这样奎披汶没有使用泰国人，而只通过行政机构强制征用了华侨来提供给日本方。3月31日，日泰两军的事务级会谈再次召开。对于决定强制征用华侨的政府意见，日本方面希望不只是华侨，也要尽可能地多征集泰国人，而且也并不赞成通过行政机构强制征用华侨的举动。日本方面希望尽快拥有大量的工人，很担心泰国方面的工作迟缓。为尽快招募到劳工，日本提议泰国向中华总商会谋求自发的帮助。由于强制征用华侨已为既定方针，而日本又突然提出需要中华总商会出面斡旋，对此泰国政府表示十分惊讶。而且泰国政府没有强制民间总商会的权限，担心一旦被拒绝，今后对华侨的统治会变得困难。泰国方面主张日本可以直接和总商会磋商，但日本方面却极力让泰国政府在中间撮合。日本坚持通过泰国政府的理由在于，之前日本宪兵已经去总商会谋求过帮助。但中华总商会却在泰国如果没有政府的命令无法实施为理由作出了拒绝。对此泰国的事务官员不知道日本与总商会私下的交涉，因而对日方的提议采取了坚决抵触的态度⁷⁰。即使知道了日本与总商会私下的交涉，由于国军最高司令官奎披汶已对内务和国防两部下了命令，这已经并非是事务官员可以做出改变的事情。

但是，收到奎披汶对华侨的强制征用命令后，在4月3日召开的内务部相关府知事等的会议上，首都警务总监拍披匿(Phra Phinitchonkhadi, 中文名, 陈玉成)转述了亚仑警察司长的意见，即与其强制征用，不如先向中华总商会探求有没有可能募集到华侨苦力。亚仑是奎披汶最得力的亲信。会议决定，在佛统府(Nakhon Pathom)、素攀武里府(Suphanburi)、叻丕府(Rachaburi)的3个府里，由府知事负责各自征集500名华侨劳工，剩余9850人名义上是在曼谷和吞武里两府进行募集，但是在两府知事和首都警务总监管下，由中华总商会来进行具体实施。此次被委以充当联络总商会任务的首都警务总监拍披匿和两府知事，当日一起与陈守明中华总商会主席进行了会见，提出了募集华侨劳工的协助邀请，并得到了总商会全力协助的回应。在这次会见中，陈守明提出泰政府应与日军就雇用条件进行交涉。为此于4月5日下午，日泰召开了两军事务级磋商。在3月的会议上刚刚拒绝与总商会接触的泰国事务官员汇报，此次是遵循日方采取非强制征用，向总商会提出了要求并得到了其合作的呼应。此外，也就详细的雇用条件向日方提出了交涉的要求。双方在此临时决定了雇用的条件。当天晚上，日本大使馆请来了陈守明、云竹亭、郑寄云、张兰臣等中华总商会的干部⁷¹。得到内务部汇报后的奎披汶于4月6日改口：“先进行通常雇用，强制征用放在以后⁷²。”中华总商会任命张兰臣为代理雇用工人委员会的主任，并在通过泰方与日本军方交涉改善条件的事宜上，于4月11日取得了一致同意。4月14日的《中原报》刊载“泰政府因需要大批工人故于最近委托中华总商会代为招雇，中华总商会于接获通知后，即毅然接受办理。”据当时的报纸记载，从4月12日该商会的代理雇用工人委员会开始募集劳工开始，到14日正午为止，共有1080人前来应聘⁷³。从总商会4月17日将第一批467名劳工从曼谷送出，到5月26日为止，共向日军提供了合计1万1577人的土木工人。中华总商会提出将首都圈外3府的1500名劳工也归并到本会监督下进行保护，内务部于4月21日认可了这一要求⁷⁴。中华总商会之所以能完成召集到大量土木工人的目标主要有以下几点要素。1、当时招工条件里的日工资金额比较诱人，吸引了大量拥有人力资源的工头(二盘工头)。2、在曼谷的代雇工人委员会办事处对各属会馆，各行业公会也分别规定下了招募名额。3、在北泰和南泰也进行了招募。中华总商会还组织募捐小组，通过这些募捐小组在华侨内募集捐款，筹集到了在各地各行招工时所需的20万泰铢⁷⁵。中华总商会虽然在表面上强调说，

⁶⁸ NAT, Boko Sungsut 2. 4. 12/12.

⁶⁹ NAT, Boko Sungsut 1. 1/121、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 WW2/1:21/15.

⁷⁰ NAT, Boko Sungsut 2. 4. 1. 2/12.

⁷¹ NAT, Boko Sungsut 2. 4. 1. 2/12.

⁷² NAT, Boko Sungsut 1. 1/121.

⁷³ 《中原报》1943年4月14日。在实际征工的《代雇工人要项》中对于每天的工资标准有如下规定。即：“(甲)每日发给三铢(伙食在内)唯工作懒惰者扣减勤勉者增加、(乙)管辖二十五人工头每日发给三铢五十士丁、(丙)管辖百人工头每日发给四铢、(附注)工头系负责管辖工人之责不必工作”(《中原报》1943年4月21日)。

⁷⁴ NAT, Boko Sungsut 2. 4. 1. 2/12.

⁷⁵ 《中原报》1943年4月21日、4月26日、4月29日、5月1日。

广大捐款者是自发自愿的，但其实有一半性质是带有强制性的。例如，1943年的5月5日，在南泰的也拉府(Yala)就总商会在府内强制招募一事，成为当天在本府召开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会议上的第一大议题⁷⁶。即便先不论华侨是否是自厢情愿应征一事，就拿工作的实际条件来讲，也是要比一般想像中的艰苦恶劣许多。为此，许多劳工一到以后就马上试图逃离现场工地。

6月9日，日方再度向泰国政府请求增援2万3千人的劳工（后改为1万3千人）。泰国政府又一次通过首都警务总监向总商会寻求援助。总商会声称各地府里没有代表，要求内务部通过地方的府知事以商讨为由，命令当地的华侨商人代表聚集首都。最终在地方的22个府内由当地的华侨商人代表配合内务部征集到了劳工，总商会负责在曼谷和吞武里(Thonburi)征集工人。从7月15日到8月31日，日方一共接收到1万2968名劳工。（泰国方面的最终统计数据为1万3097人。其中，从曼谷和吞武里府征集到的劳工数为5320人。最终实际到达建筑工地的劳工却只有上述人口的43%，其余的都在半路上逃跑了⁷⁷。

在第二次征集中，不仅习惯了通过总商会来征集劳工的首都一派，连地方官吏也将征集对象放在了广大华侨身上。1943年7月30日，担当征集工作的北柳(Chachonsao)副知事在本府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上对在场的干部职员作了这样的讲话。“我们不想让泰国国民受苦是将征集的主要对象放在华侨身上的原因之一。在这次战争中，我们泰国军队为了捍卫独立，保卫国家，在战场上流血流汗。可是，外国人却可以不背枪杆子上战场，而是在内地安居乐业，从事买卖，榨取我们泰国人的利益。当然，如果华侨问起来的话，我们决不可以这样说。要用其它的回答方式，以避免在他们心中产生隔阂…当然，我们也可以募集泰国人劳工，但在这种情况下，就得确认他们是否是自愿参加的⁷⁸。”

总商会将这次的征集作为“第二次代理招募劳工”，与第一次采取了一样的配合体制⁷⁹。对于总商会的合作，日泰同盟联络事务局的皮西特中校1943年7月28日在对泰国方面的宣传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华侨的处境现在很艰难，心中一定也有很多的不满…我们虽然委托了总商会来征集劳工，但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了华侨之间的强制问题，日本对华侨的强制问题，以及日本对华侨的煽动问题。我所说的华侨之间的强制问题是指，将总商会在征集劳工时所需的高额费用强制分摊到各位有名的华侨人士头上。日本对华侨的强制问题是说，日本表示如果华侨不配合，就把他们作为重庆帮来问罪。这也正是华侨很害怕的一个关键所在。最后所谈到的日本对华侨的煽动问题是指，日本控制下的《中原报》做出代表广大华侨利益的样子四处活动。当时该报的目的是让广大华侨产生亲日情绪。换言之，《中原报》促使广大华侨进一步产生了厌泰情绪⁸⁰。”

通过华侨领导者张兰臣的公司为了铁路建设，提供给日军地基用石的这一事实⁸¹来看，很难说在泰缅铁道建设的过程中，是不是所有的华侨都变成了单纯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时期里，泰国政府为了满足日本的劳工需求，尽量少用本国人，多用在泰华侨的举措，加上日本声称，对不合作的华侨将按重庆帮成员一样实行重处的命令，的确使华侨处在了水深火热之中。

华侨对釜披汶压迫政策的反抗也可以通过1943年8月26日内务次官提供给釜披汶国军最高司令官的报告中略知一二。这原本是犁逸(Roiet)的府知事汇报上来的内容。“1943年6月24日，在泰国国庆节之际，地方知事邀请府内主要的华侨一起参加晚会，谁想当日只有一人到场“赴宴”。当时釜披汶正在强制推行新文化，华侨借口对泰国文化没有太多了解，如若违背了文化风俗习惯，反而会被耻笑，故未去赴宴。其实，在这背后，真正的原因所在还是由于华侨将泰国政府和日本作为敌人来看待。华侨对泰国政府实施的歧视性泰国人职业保护，通过建立禁区而对华侨下达的驱逐令，以及日本的强制性劳务制度(泰缅铁道建设中的苦力)怀有极大的不满⁸²。

⁷⁶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WW2/1:21/12。

⁷⁷ NAT, Boko Sungsut 2. 4. 1. 2/12。

⁷⁸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WW2/1:21/13。

⁷⁹ 《中原報》1943年8月4日。

⁸⁰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WW2/2:2/10。

⁸¹ NAT, Boko Sungsut 2. 4. 1. 2/7, Boko Sungsut 2. 9/8。这是战争期间华侨领导者在対日合作中取得好处和战争暴发户的一大事例。张兰臣在战后唯恐被暗杀，长期不肯露面。以后，他返回了中华总商会主席的要位，在与台湾的交流中发挥了贡献作用。

⁸²NAT, Boko Sungsut 1. 13/60。据警察在1943年3月的报告中证实，Roiet是当时重庆派的一个落脚点（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WW2/1:21/12）。泰国政府于1940年的10月15日公布了民族文化振兴法。该法律最初只是以本国国民为适用对象，但在1942年4月28日经过修改后，将外国人也列入了该法的适用对象范围之内。

<3>趋于恶化的日泰关系及华侨问题

銮披汶从战前就有了以迁都来作为泰国防卫战略的构想，就在战争爆发前一刻，他还尝试过向北方迁都。这一构想在开战后也没有被中止。并于1942年6月制定了向沙拉武里府(Saraburi)、大城府(Ayutthaya)迁都的计划。但是，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于1943年被新的计划取代。1943年2月25日，銮披汶为将国军最高司令部转移到邦帕因(Bangpain)，下令开始建设当地的道路⁸³。

1943年3月之后，銮披汶更加大了对日本的不满。从以下事例可以看出日泰同盟变得形同虚设。例如1943年1月，当日本在曼谷设置驻屯军司令部时，銮披汶立刻作出了如下回应，即将长期以来作为日泰两军的泰方联络机构日泰政府联络所，于1943年3月18日改组为新机构。在命名此机构时，銮披汶拒绝了使用事务局提出的“驻泰日本联络局”的名称，改用“同盟国联络事务局”其理由为“驻泰日本联络局这个名称让人觉得这个机构是因为日本会永久定驻在泰国而为此设置的，这就显得意义太为狭窄了(1943年3月8日)⁸⁴。”銮披汶执意省略日本名称，将新机构定义为“战争时期中，泰国与日军及同盟军之间的唯一联络机关⁸⁵。”銮披汶将日军与同盟军相提并论，并在战后将此作为自己抗日的一个事例。但在当时，銮披汶对日本方面却是进行了另外的说明。1943年3月25日由山田国太郎陆军武官寄给日泰同盟联络事务局局长的泰陆武第60号信中记载着“关于贵方的1556/86的号文件。按贵国政府所述，封闭了以前的日泰政府联络所，取而代之设置了更为强大的组织，即日泰同盟联络事务局。这一举措将更有利地促进日泰双方的共同作战。这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⁸⁶。”日本方面继续称此机关为“日泰同盟联络事务局”，到1945年滨田平陆军武官就任时改称“同盟国联络事务局”。

日泰同盟解体的另一例，则可从日泰同盟联络事务局(依日方称谓)副局长皮西特中校在1943年5月11日会议上的发言中读出。这次会议的背景是，里绿驻日本大使向泰国外交部报告说“日本大东亚部的官员及部分报刊传出，如果泰国人民不能不遗余力地支持日本的话，那么泰国的独立及主权就将成为一个未知数”。得到报告的銮披汶首相在笔录中写到，泰国已经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支持日本，并于5月5日的内阁会议上审议加强在日的宣传活动，因而有了5月11日这次会议的召开。在外交部长充当议长的会议上，皮西特作了发言，“泰国和日本在立场上有很大不同。对方完全不顾忌我们，而我们却总在为对方着想。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保持中立不为日本，也不为其它任何一方。我认为这是我们政府明确的立场”。并反对向东京派驻泰国的宣传官员⁸⁷。当时作为担当与日军进行实际联络工作的泰方负责人皮西特中校作了与日泰同盟原则不相容的发言，并提出泰国中立政策的时候，在座的外交部及军方高官，乃至宣传司长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战况对日本不利的事实逐渐露出了水面。1943年5月12日内阁作出了由外交部考察战况的决定。1943年6月10日，銮披汶决心迁都至北泰的碧差汶(Phetchabun)⁸⁸。1943年6月，銮披汶又命令组织民兵训练，建立抗敌武装⁸⁹。

日本方面，1943年1月新设立的泰国驻屯军司令部中村明人司令为改善日泰关系致力解决敌对性资产问题。1942年12月18日发生的万磅(Ban Pong)事件，也于43年5月15日做出了最终的解决。其方式是，日方将在万磅事件中被泰国警察所杀害的日本官兵家属所收到的慰问金直接返还给了泰方，用于抚慰日军进驻泰国时泰方的死者家属⁹⁰。而且，访问曼谷的东条首相在于1943年7月4日与銮披汶首相的会见中表示，“日本帝国希望得到銮披汶的真诚理解。日本帝国期待贵国鼓舞广大国民，提高斗志，携手强化战争期间的体制，为共同作战发挥一切力量。”(What Japan expects from Thailand is that Your Excellency, understanding the true intention of Japan and assured of her full support, will vigorously execute all sorts of measures necessary for the heightening of the nation's fighting spirit, strengthening of the wartime structure and for the prosecution of the common war.)并将承认马来亚的4个州及掸邦的2个州并入泰国领土的备忘录亲手交给了銮披汶⁹¹。扩张领土是銮披汶首相多年的夙愿，这无疑令他

⁸³ NAT, Boko Sungsut 1.7/20.

⁸⁴ NAT, Boko Sungsut 1.1/98.

⁸⁵ 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WW2/2:2/13.

⁸⁶ NAT, Boko Sungsut 2/67.

⁸⁷ 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WW2/2:2/4.

⁸⁸ NAT, Boko Sungsut 1.9/1.

⁸⁹ NAT, Boko Sungsut 1.16/94.

⁹⁰ 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WW2/2:11/45.

⁹¹ 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 WW2/2:17/1.

十分高兴，但作为促使銮披汶首相恢复支持日本的策略，还是晚了一步。特别是在1943年7月，巴多格里澳(Badoglio)取得意大利政权后退出了轴心国，泰国也注意到了不断增大的同盟国的优势。銮披汶放弃了目前为止的迫害华侨的政策，重新尝试联系重庆政府，另一方面对日本的合作限定在不招致日本武力进攻的范围内，保持最小限度的接触。泰国政府与华侨的关系开始好转，这两者与日本的关系却变得更加对立起来。

这一时期反映泰国政府与华侨关系的事例有1943年10月11日中文报纸《泰华商报》的创刊。此报刊由李一新(泰国名为Ari Liwira)和拥有多家报社的披耶普里恰努萨特(Phraya Prichanusat)从43年3月起就一起开始着手准备。銮披汶国军最高司令官有根据戒严令检阅报刊发行机关的权力，他授意报刊的监督负责人即宣传司长对《泰华商报》的发行做出了许可⁹²。銮披汶和该报刊的关系不仅于此，当时负责对日谍报工作的宣传司长帕伊楼头(Phairot Chaiyanam)作为銮披汶的心腹，为使《泰华商报》遵从政府的政策运转而将李一新安插了进去⁹³。

此报是由泰国人经营的中文报刊。负责编辑的是李一新，连吟啸，梦熊等重庆派的新闻人士。该报作为一个抗日机关，以不允许“伪中原报”做出的事实歪曲，唤醒华侨的爱国心为目的⁹⁴。但是，阅读战争时期的《泰华商报》，却可以发现很多对日本及公开保持与日本同盟关系的泰国政府的阿谀性报道和评论。1943年10月30日日华同盟条约成立之际，该报与中华总商会，六属会馆，中原报一起，向汪精卫主席致电“中日两国关系已因此条约之签订而趋于友好，大东亚新秩序之建设亦将为益为促进，而我国且因此获得完全独立及自由，此乃我公为国为民努力奋斗所致，侨等谨代表全体侨胞向我公致最高之敬意⁹⁵。”连吟啸于战后回顾时阐明，当时很怕这份与泰国人合作出版的中文报纸会不会招致愚昧的华侨对此报产生是汉奸的误解，而从这次贺电来看那么想也不足为奇。但是，同时期刊载的让人联想同盟国获胜的报道，以及一些暗示着日泰间对立的评论，还是极大刺激了日本的宪兵队。李一新在1943年10月14日被在日军请求下的泰国宪兵抓获，而在交给日方之前，李一新在泰方默认下得以逃脱⁹⁶。得到宣传司长对此事的汇报后，銮披汶于1943年11月28日命令“和警察商量一下，让警察保护我们自己的报社，就以防止情报工作泄露为由。那样日本也就无法采取行动了。我们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再把处理结果汇报给我吧⁹⁷。”日本方面在外交途径，或是在日军与泰军定期召开的宣传负责人会议上经常将《泰华商报》作为问题提出来。例如1944年4月5日由坪上大使给里绿外交部长的公文，外第38号中“当地泰华商报创刊以来，屡屡刊登一些或违背常规，或荒唐无稽的文章和相片。该报在3月28日出版的报纸的第一面，对于英国丘吉尔(Churchill)首相的演说，以“尚自信英国必获得胜利”为标题大肆进行宣传。如上所记，我们认为此报社有混入重庆分子的可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必将对今后的决战产生影响。我们请求对此报纸采取严加调查。”对于以上抗议，外交部将“该报别无他意”这一宣传司长的调查结果原封不动地传达给了日本大使。但是，据宣传司长在内部会议上的陈述，该报的职员有八成为重庆派⁹⁸。

体现銮披汶对华侨态度变化的另一事例，则是对华侨的领导授勋一事。1943年12月10日，泰国尼耀姆(Thai Niyom)社的总负责人伍竹林(泰国名竹林蓝三(Chulin Lamsam)，以及1944年1月26日陈守明中华总商会主席各自被授予3等王冠勋章⁹⁹。3等勋章在国内是授予中大校级别，文官的府知事，部的科长级别的，虽然在当今有很多华人得到了很高的奖章，但这在当时确实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原报》评论陈守明授勋是“这次荣誉的恩奖在旅泰华侨史上为首开纪录的光辉的第一页……而光荣则归功于全侨社。¹⁰⁰”

銮披汶还于1943年10月15日向旺亲王(Prince Wan)咨询了有无将全体华侨一起并入泰国国籍的方法¹⁰¹。

1944年1月末，銮披汶命令掸邦的西北军与云南的重庆军(第93师)取得联系。泰国西北军

⁹² NAT, (2) SoRo. 0201. 98. 2/2.

⁹³ NAT, Boko Sungsut 2. 7. 4/24.

⁹⁴ 《泰华商报》1945年10月10日。

⁹⁵ 《泰华商报》1943年11月2日。

⁹⁶ NAT, Boko Sungsut 2. 7. 4/24.

⁹⁷ NAT, (2) SoRo. 0201. 98. 1/14.

⁹⁸ 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WW2/2:12/4.

⁹⁹ NAT, (2) SoRo. 0201. 46. 3/31, NAT, (2) SoRo. 0201. 46. 3/31.

¹⁰⁰ 《中原报》1944年1月27日。

¹⁰¹ NAT, (2) SoRo. 0201. 76/15.

第3师长汉森库拉姆(Hansongkhram)少将通过送还重庆军的俘虏, 尝试联系第93师。2月, 第3师长的代表与第93师的代表在中国方面的边境打洛镇(泰国名 Chiang Lo)进行了会见, 双方确定了两军的停战, 同时进行了情报的交换。3月中旬, 銮披汶国军最高司令官下令汉森库拉姆少将, 让他与重庆军商谈对日协同作战的计划。少将亲自于4月2日赶赴打洛与第93师的代表进行了会见。这次会见商议了有关政治及协同作战的计划, 为加强泰国空军的力量, 同时也向中国提出了支援要求, 以及要求中方也将此转达给英美。第93师代表答应将商谈事项如实报告给蒋介石。4月末, 中国军方密使向泰国方面表示, 重庆正在着手准备迎接泰方的代表团, 并希望泰国在接到重庆的回复前筹备派遣代表团的工作。銮披汶任命了銮亚仑为团长¹⁰²。但是, 蒋介石对接受泰国代表团到重庆访问这件事, 一直到銮披汶政权倒台为止, 也没有传来下文。

中方的第一手历史记载中也有銮披汶背叛日本的这一记录。1944年6月9日远征军司令官将从第93师收到的电文, 又汇报给了何应钦总长。其内容是“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自保山转报策动泰军反正情形电。”在这里也记载着泰方书简的要约内容。其主要内容有“1、关于以前向贵国(重庆)要求提供200架驱逐机的事情, 请抓紧与中央政府联系希望尽快给与答复。另外, 考虑到将来的反攻, 同盟国方面有必要在泰国的国境上设置一些机场, 请指定地点及时间, 泰军既将在指定地域建设机场也将全力进行防卫。我们保证泰国陆军将参加反攻。2、泰国希望尽快加入同盟国。我们希望中方将泰中双方交涉的事实通知英美, 并让英美派代表一同参加双方的交涉。3、我们将送上记载敌军(日军)在曼谷、喃邦(Lampang)、清迈的驻屯地, 军事设施的地图请依照地图进行轰炸¹⁰³”这份书简与汉森库拉姆在战后的回忆大致相同。另一方面, 日方担心泰国与重庆方面建立内应关系, 于1944年3月向西北军派去了贝沼研造大尉作为联络官员。据贝沼回述, 日本总部曾破读了泰军与重庆间的电报而联系了南方总军, 他受命调查泰军与重庆间有否内应, 因此被派遣到西北军。但是, 调查的结果却是以没有找到内应的证据而告终¹⁰⁴。

1943年11月, 銮披汶自己拒绝出席, 而让旺亲王代理出席由日本政府在东京主持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东条首相力图通过此次盛会向同盟国显示大东亚诸国间的团结及力量, 此次大会对日本而言, 可说是意义重大。正因为此, 日本政府数次向銮披汶要求出席, 但銮披汶总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加以推托。同时在11月下旬又成立了民族名誉振兴委员会, 民族纪律振兴委员会, 民族素质培养委员会等5个加强国民素质的委员会, 旨在通过这些委员会的成立来谋求泰国国民的一致团结, 并为抗日作心理准备。

1943年12月27日在旺亲王出席大东亚会议的归国欢迎会上, 坪上大使作了演讲, “基于大东亚共同宣言, 贵国与日本帝国再度加强了共同合作以创建大东亚、和推进大东亚战争的决心。这是源自我们之间的力量和威望要远远超出同盟国内部。……开战伊始, 贵国确立了作为大东亚先锋的地位, 具有非凡的意义。作为我们日本国民, 衷心希望贵国将自始至终保持作为先锋的地位。”(With the adoption of this joint declaration, both Japan and Thailand have strengthened further their pledge and determination for coope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reater East Asia as well as in the War of Greater East Asia on the basis of strength and gravity greater than the Pacific of Alliance …The position as an East Asiatic pioneer which Thailand established at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was indeed very invaluable, therefore, we, as the people of Japan, particularly hope that Thailand will preserve to the end the glory as a pioneer of East Asia¹⁰⁵.)坪上高度评价泰国在开战后所给予的合作, 希望以大东亚共同宣言为基础来强化日泰合作关系, 但是銮披汶却相反进一步加速了与日本的分裂。

1943年12月19日深夜的空袭, 是同盟国军队对曼谷的进行的第一次正式攻击, 12月21日銮

¹⁰² 《銮汉森库拉姆(Luang Hansongkhram)大将自传》(泰语)曼谷 1969年 122-127页。

¹⁰³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三)》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年 492页。

¹⁰⁴ 1990年3月2日贝沼研造先生的采访录。日本当时为了恐吓泰国政府, 将破解的重庆军密码中的情报如下所述提供给了泰国军队。即:山田国太郎陆军武官在1944年4月19日发给泰国参谋总部第2部长的泰陸武第194号中, 作为确切情报表示, 远征军司令官卫立煌于3月末电告第93师长, 该司令长官直属的3个工作组将经过第93师担当的地区后, 潜入到日军后部, 对此要给予协助(NAT, Boko Sungsut 2.7.4/41)。此外, 日军好像也破解了泰军的密码。1944年9月16日在喃邦(Lampang)的泰国空军中校听友人的日本家本宪兵少尉说, “清迈的泰国军队高官秘密沟通间谍, 将日军的动向及机场的情况信息提供给敌方”。此空军中校将此道听途说的情报报告给上司, 泰国军方获得这一情报后, 发现同他们已掌握的情况一致, 当时泰国军队的实质性最高责任领导者西那特(Sinatyotharak)中将下令说:“早就听说我方的暗号有所泄露。让陆军副参谋长立即进行更改。否则的话, 我们的暗号就完全起不到保密的作用了。”(NAT, Boko Sungsut 2.9/20)。

¹⁰⁵ 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WW2/2:5/1。

披汶没有出席日泰同盟 2 周年的重要纪念庆典¹⁰⁶。坪上大使曾强烈地要求銮披汶出席这次庆典，就连刚被銮披汶由驻日大使转调到外交部长的亲英派里绿也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我在和日本大使会见时，刚谈到首相有可能不出席庆典时，大使的脸色马上就变了。首相一向深知我历来对日本素无好感，但还是相信我，让我担任该职位。但如果首相改变了既往的策略，那真不知日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我这么说全是一片真心之意，决不是因为害怕日本¹⁰⁷。”比起原本就非亲日派的里绿来说，此时的銮披汶表现出了和日本更加疏远的态度。

以后日泰关系不断恶化，洞悉銮披汶内心的文武官员也开始故意疏远和日本的合作。在这种状况下，泰国驻屯军司令部于 1944 年 2 月 5 日发布“中村大日本陆军最高指挥官对泰军最高司令官銮披汶的劝告”，来加大对泰的合作压力。此外，从战前就一直处于亲日派的大臣瓦尼特因渎职被逮捕，尽管日本大使馆对此提出了宽大处理的请求，瓦尼特却于 5 月 21 日奇怪地死去，这也大大地加速了日泰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泰国一直拖延日本要求的巨额军费，双方发生了分歧，最后竟升级到泰国召回了銮威集驻日大使（前外交部长，与里绿交换了职位）的严重事态¹⁰⁸。

但是，在銮威集回国之前，因政治独裁而失去议会多数派信任的銮披汶在议会中提出的法案被屡屡否决。同时日军不再维护銮披汶，而是拥护议会中反銮披汶的一派，禁止銮披汶采取迫害反对派的武力制裁。1944 年 7 月末，銮披汶被迫作出了辞去内阁一切职务的决定。

< 4 > 宽·亚派旺政权下的华侨问题

在日泰关系最紧张的这个时期，偏偏又发生了拉依(Ranong)事件。驻留在位于拉依对岸的缅甸维多利亚帕因特的日军误认为日泰两军在曼谷发生了交战，于 1944 年 7 月 30 日傍晚，强行解除了当地泰国警察和军队的武装力量，同时也拘留了文职人员，到 8 月 2 日为止拉依一直处于被日军占领的状态之下。在拉依事件里，泰国军人 12 人，警察 3 人，文职人员 4 人被日军杀害¹⁰⁹。这一事件的发生更加大了日泰两国间的互相不信任的程度。

日军在拉依事件中使武力一事，也是这以后使得泰国在对日态度上变得比以前慎重起来的原因之一。日本在战争中不利地位的进一步恶化，并没有使得泰国加强在对日立场上的态度。这时候，日本对泰国行使武力的危险性却有所增加。宽新政权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一边最大限度地战争所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少，一边还要维护住泰国的独立。与銮披汶时期相比，宽新政权下的日泰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对于新内阁的对日政策，日泰同盟联络事务局副局长皮西特大校如此形容。“对日本履行义务是关系到我国名誉的问题。我们要忠诚完整地贯彻下去。有做不到事情，就明确地向日方提出，争取对方的同情¹¹⁰。”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就銮披汶政权时迟迟未交付给日本的军费问题，双方也一下子达成了共识。8 月 22 日，两国决定不将拉依事件做为影响双方关系的主要因素，而只是做为地方性的问题来看待。“双方已对此次事件达成了相互的完全谅解，确认了此事件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宽执政时期，由銮披汶政府遗留下来的对华侨的强硬政策也得到了很大的缓和。銮披汶执政时期，于 1941 年 9 月 11 日公布了“职业援助法”。此令文规定出了只有泰国人才可以从事的一些工作。1942 年 6 月 9 日，实际公开规定出来的保护泰国人的工种达到了 27 项¹¹¹。銮披汶不仅制定出了限制华侨，保护支援泰国人的歧视性的就职法令，设立对中国人的禁区，还在泰缅铁路建设上大肆强制华侨作为劳务工人去卖命，这些都是銮披汶政权排华的主要表现。宽政权成立以后，立刻设立了以童普来·琼普(Tongplaew Chonphum)为首长的国家经济问题检讨委员会。童普来在有关对华侨就职制限的问题上表示，“考虑到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应该取消与华侨之间的对立，缓和双方关系¹¹²。”在 1944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的阁会上，除了做佛像的手艺人，律师等 4 种职业以外，其余的职业不再对华侨加限的决议通过。11 月 24 日这一决定在官报中发表，当天得以正式实施。

此外，尽管在 1942 年末和 1943 年初，干乍那武里(Kanchanaburi)、万磅(Bang Pong)方面和北泰的 6 个府也就外国人(华侨)的驱逐令问题进行过讨论，但 1945 年 2 月 21 日，检讨委员会议长

¹⁰⁶NAT, KoTo. 73. 6/24, 《泰商华报》1943 年 12 月 22 日。

¹⁰⁷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WW2/2:3/6。

¹⁰⁸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WW2/2:4/25。

¹⁰⁹NAT, (2) SoRo. 0201. 98/44。

¹¹⁰ NAT, WW2/2:2/10。

¹¹¹ Prachachat 11 June 1942。

¹¹² NAT, (2) SoRo. 0201. 22. 4/7, 13。

在发言中还是以“在紧张的局势下，泰国居民对外国人存有恐惧心理，同时日本方面也会认为泰国在不给予合作”为由，继续保留下了对外国人的驱逐令。不过对一些个别性的许可项目，采取了允许华侨返回禁区的特殊许可政策¹¹³。

在为泰缅铁路建设提供劳工一事上，日军在1944年4月2日发给日泰同盟联络事务局局长泰陆武的第159号文件中，请求泰国政府在征集泰缅铁路建设需求的5000名劳工时提供方便。日军希望每天支付给新雇佣劳工的工资为1泰铢，饭费由日方另行负担。但当时已在工地现场的劳工每天却可以得到3泰铢(包含饭费)。相比之下，日军后来提出的预算就显得太低了。泰国表示在此条件下很难征集到劳工。此外，5月末日军对中华总商会提出向日方提交1800名劳工，按每月100名，在18个月内完成的要求。7月末，泰国政府通过曼谷府知事，首都警务总监也向中华总商会发出了征集6800名劳工的请求。8月2日，总商会主席陈守明向泰国政府提出，希望泰国政府命令各地政府对此次征集劳工提供帮助，并一同提出了总商会考虑的征工条件。在劳工自己付饭费的情况下，每天的工资标准为6.5泰铢。

日军和中华总商会在劳工工资问题上的差距以及总商会长期的消极对应态度，使得日本向监督官厅泰国的内务部发出了对总商会施加压力的要求¹¹⁴。11月末，最终的磋商结果为劳工每天的工资为6泰铢(日本以饭费为由，先行扣除1.5泰铢，实际支付额为4.5泰铢)。在总商会召集到的6800名劳工中，有4800人是来自于首都周围的曼谷和吞武里¹¹⁵。当然在这次征工中所需要的经费也是由总商会从首都附近地区的华侨商人中募集得到的。尽管名义上称为募捐，实际上却是由总商会通过内务部委托给首都周围的各县长，命令他们召集华商聚集到一起，将预先规定好的捐款金额传达给大家。最后由总商会出面征收¹¹⁶。总商会在曼谷为日军征集到了2032名劳工(日本统计数字为2001名)。其详细内容为：1944年12月12日(400名)，12月17日(509名)，12月22日(718名)，1945年1月11日(405名)，共计：2032名。但大多数的劳工在曼谷领取到10泰铢的预备金后就逃之夭夭了。在第三回征集到的718人中，实际到干乍那武里的劳工只有61人。第四回征集到的405人在曼谷出发前就集体逃走了。日军征集到的2001名劳工中，到1月19日时只不过有107人在现场工作。

日军不再通过总商会进行征工，而是要求泰国政府惩罚逃跑者，结果一直中断了征工。在3月初，日本正式做出了停止招工的决定¹¹⁷。总商会的“泰国政府委托第三次代雇招工”工作从实质上来讲，是以没有给日军提供出较大效益而告终。

这个时期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下抗日活动也变得更加活跃起来。1944年3月6日夜里11时，5名在泰国出生的华侨将校由英国的飞机跳伞到曼谷附近的佛统(Nakhon Pathom)。这也是利用同盟国的飞机向泰国派遣间谍的一个开端。5名空降间谍中，2名被击毙，2名被活捉，只有1人成功地潜入了泰国境内¹¹⁸。此外，自由泰的空降间谍也于3月15日凌晨1点多在猜纳(Chainat)投入了第一支由泰籍华人普阿翁帕空(Puey Ungphakorn)率领的间谍小组。5月3日凌晨1点多，在南泰的峰柑(Phangga)海岸上，乘坐英国水上飞机欲潜入泰国的4名华侨将校中，2名被击毙，2名被逮捕¹¹⁹。4人当中有3人是在泰国出生的华侨。4人皆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是英国的SOE(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在对泰国工作期间从戴笠将军所统辖的军统局借用的人物。这4人也曾在印度接受过培训¹²⁰。

在前文中笔者已介绍过，在开战以前，戴笠将军的侍从室已经派遣过蓝东海等人的间谍组织。1944年8月26日，日军在和泰方取得了联系后，派出104名宪兵袭击了蓝东海小组在吞武里的无线通讯处，逮捕了通讯员李深。8月27日早上，又接着逮捕了4人。据他们的交待，被逮捕者的人数到1944年9月6日为至，按照泰国派遣宪兵队作出的“被检举者一览表”来看，高达45人。在宪兵调查的过程中，发生了一向坚强不屈的间谍被杀害的非常事件¹²¹。在这次大搜捕中，蓝东海

¹¹³ NAT, (2) SoRo. 0201. 76/14.

¹¹⁴ NAT, Boko Sungsut 2. 9/28.

¹¹⁵ NAT, Boko Sungsut 2. 4. 1. 2/12.

¹¹⁶ 《中原报》1945年1月4日。

¹¹⁷ NAT, Boko Sungsut 2. 9/28, Boko Sungsut 2. 6. 8/1.

¹¹⁸ NAT, Boko Sungsut 2. 7. 4/34.

¹¹⁹ NAT, Boko Sungsut 2. 7. 4/44. 泰国黄埔校友会编辑委员会《铁血雄风、泰国华侨抗日实录》曼谷、泰国留华同学会1991年。

¹²⁰ Cruickshank, Charles 1983, *SOE in the Far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3.

¹²¹ 泰国外交部文件科保存外交文件, WW(Beattalet) 18. 5, NAT, Boko Sungsut 2. 7. 4/60, 67, 68, 75.

等人逃脱了搜捕再度返回到了重庆。他们于 1944 年 7 月 7 日在地下创办了报纸《中国人》。但在 8 月末由于揭发被迫中断出刊。蓝东海等人由重庆再返回泰国后于 1945 年 5 月 20 日出版了复兴第一期报纸后，到战争结束一共坚持出版了 4 期报纸¹²²。蓝东海在战后，立即以中国国民党特派驻泰指导专员(或者是中央特派暹属党务指导员)的身份于 1945 年 8 月 20 日设立了六属会馆临时联合办事处。和日本有过密切联系的主要领导人唯恐受到惩处，纷纷隐藏了起来，蓝东海在当时混乱的华侨社里作为领导者一直指挥工作到 9 月 5 日¹²³。

1945 年 9 月 5 日，以邢森州特派员为名的中华民国中央海外部泰国特派员办事处在曼谷成立。由于当时邢森州尚未在泰国国内，所以由成烟景(真名:陈英谨)担任主任秘书，蓝东海在其手下担任科长¹²⁴。陈英谨在公开场合下是海外部的一名成员，暗地里也是从战争结束以前就受命于秘密组织军统局被派到泰国的人物。陈的小组出版了地下报纸《反攻报》。尽管这个报刊在战争期间只出版了 7 次左右，发行量也只有 200-300 部，但很多人当时互相传递阅读，读者量还是颇有规模¹²⁵。

重庆的军统局对派出的间谍小组之间并不予以相互介绍。比如说以陈艺少校为代表，其手下有 4 名成员出身于泰国，毕业于黄埔军校的人物作为军统局的直属秘密组织于 1944 年被派遣到泰国。这个组织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通过无线将日军情报传送给军统局。这个机关同时也负责将间谍以苦力的身分派遣到日军基地后，命令他们从日军内的朝鲜人，台湾人中间获取情报。陈艺的这个小组是一个纯粹的间谍组织。他与其它一般间谍组织不同，既无一定的大众性，亦没有发行报刊的任务。这个组织从未被人向日军举报告密过¹²⁶。

此外，当时还有受命于重庆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卓献书暹罗军事专员手下的军人一同潜入到泰国的黄绿峰的小组。这个组织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驻泰国支部，一方面通过出版“警报”从事宣传活动，一方面也组织训练突击队¹²⁷。据参加过该报印刷的黄立民介绍，此报当时是在曼谷近郊的佛统府森林里以每星期两版的进度来印刷发行报刊¹²⁸。

1942 年 12 月 1 日、泰国共产党从华侨共产党分离出来。1942 年 5 月 1 日劳动节，泰国共产党出版了《玛哈春》创刊号(泰语版)。1942 年 7 月 25 日以李启新(S. 素林)为领导，李华、丘及等人为干部¹²⁹的共产党员在地下出版了《真话报》¹³⁰。1944 年 12 月 23 日，共产党召开了反日大同盟(反盟)第一回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反日大同盟是在 11 月 25 日由真话报、大众报(泰国名为:玛哈春)、人民报社、泰自由团(Thai Ekarat)、泰南抗日同盟总会、曼谷各业工人联合会、大众学习社泰国国内 7 个团体共同筹划的¹³¹。第一回全国代表大会是以丘及为主席，由来自全国各地的 40 多名代表汇聚在吞武里的甘蔗田地里召开¹³²。反日大同盟的目的是，联合全国人民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泰国，配合中国和其他国家一同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代表也以观察员的身分参加了这次大会¹³³。本次大会选出了 11 名执行委员。这些执行委员将《真话报》的杨世瑞和《玛哈春》的威洛·安派(Wirot Amphai)选为执行部的负责人，两人的职位分别为中文和泰文秘书长¹³⁴。在此阶段，从华侨共产党与泰国共产党一同从事反日大同盟活动一事看来，我们可以认为华侨共产党和泰国共产党应还属于同一组织。反日大同盟成员中既有华侨，也有泰国的团体和个人，总人数达到 1 万 1 千人¹³⁵。1945 年 1 月中旬，丘及与威洛·安派两人同自由泰的领导人比里·派依荣摄政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前者除了向比里·派依荣摄政公开了反日大同盟的成立以外，并代表共产党向后者表示，希望在抗日战争中双方能够并肩作战。但在此之后，直至二次大战

¹²² 1992 年 7 月 19 日蓝东海先生的采访。该氏保存了《中国人》的所有出版号内容。

¹²³ 《中原报》1945 年 8 月 22 日。

¹²⁴ 《泰商华报》1945 年 9 月 6 日。

¹²⁵ 1994 年 1 月 6 日陈英谨先生的采访录。该人是辻政信《潜行三千里》中成主任的代表人物。

¹²⁶ 1993 年 12 月 29 日陈艺先生的采访录。

¹²⁷ 泰国黄埔校友编辑委员会《铁血雄风、泰国华侨抗日实录》323-324 页。

¹²⁸ 1994 年 1 月 6 日黄立民先生的采访录。

¹²⁹ 泰国归侨联谊会英魂录编委会编《泰国归侨英魂录(1)》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89 年 411 页。

¹³⁰ 杜英《参加泰国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 5 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 90 页。

¹³¹ 泰国归侨联谊会编《湄江风云》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3 年 29 页。

¹³² 2000 年 2 月 16 日，吴维实(Damri Ruangsutham)的采访录。

¹³³ *Mahachon*《玛哈春》报纸 1944 年 12 月 26 日。

¹³⁴ 泰国归侨联谊会编《湄江风云》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2 年 22 页，《林莎南追悼书》中吴维实先生的回想录 曼谷 2000 年。

¹³⁵ 李启新《湄江留言》北京 1990 年 107-108 页。

结束为止，共产党方面再也没有从自由泰方面获得任何积极反应¹³⁶。在战后 1945 年 10 月 31 日召开的反日大同盟第 2 回全国大会上也有来自 53 个团体的 142 人参加¹³⁷。

丘及在 1945 年 9 月 12 日中英泰记者座谈会上，就战争期间共产党的抗日活动做了如此评述。“在日军南侵后，中泰两民族共同执行抗日的工作，可在泰国各地常时发现，而造成双方合作抗日其因，盖以中泰两民族均为祖国独立自由，为解除奴隶之桎梏而奋斗…关于此事实，如拉依府泰国军警之抗日事件，华侨曾与以热烈的援助。反日大同盟及抗日义勇队过去在泰南进行抗日战争中，不断获得泰国军民之协力，其次泰华工人在各地掀起反日运动，破坏日军仓库等等¹³⁸。”在这个发言中，可以看出共产党一方将拉依事件也作为了自己的功绩，但实际上，共产党的活动开展得并不活跃，范围也很有限。1944 年末，共产党基于急剧变化的局势，判断武装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1945 年 2 月至 3 月间，正式开始了为购买武器的募捐及武器征集的活动。同时也开始以抗日义勇队队员为对象的武器训练。在曼谷及泰国南部，分别设置了两个抗日义勇队的总司令部。曼谷的总司令部的总负责人为方流（他在就学时使用的正式姓名为洪书从，在中国使用的姓名为张远，泰国名字为 Wirat Angkathawon）。方流在丘及的领导下开展活动。泰国南部的总司令部（泰南义队总部）的总负责人为余松（曾化名：巴颂·翁威瓦，1952-1961 泰国共产党总书记），刘源泓任政治主任。该组织被称为泰南抗日义勇队¹³⁹。二次大战结束时，全国处于武装战斗状态的抗日义勇队队员人数为 650 人。南泰的义勇队接受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的训练及武器上的援助。全国范围内，在抗日义勇队组织下发动的针对日军的军事进攻仅为一次，具体是余松领导的 30 人义勇队，在日本战败后的 8 月 19 日，对宋卡府枇杷县的日军驻地发动的夜袭¹⁴⁰。

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以歼灭汉奸为重点，战争末期，华侨指导者对日合作变得消极，在背后积极捐款支援抗日活动。比如说在 1944 年 4 月 17 日出版的《真话报》（第 34 号）中有以“警告为虎作伥的华侨奸商”为标题的社论。李启新在文章中写到“我们不否认，由于泰国是日寇的附庸，日寇当然具有着很大的可能来略夺泰国的物资，但假如华侨奸商不替它收买与制造，那么，日寇不但不能获得巨大的数量，而且还要遇到不少的阻碍与迟延…我们同时呼请一切工人和职员们觉悟起来，勿再为奸商们的图财祸国而工作，反之，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阻止与打击他们的汉奸行为！”同时，也列举出了叶贤才等人的名字进行抨击。在 1944 年 9 月 5 日的《真话报》（第 44 号）中以“陈守明张兰臣两逆，依然藐视国法污辱侨众，近又在伪商会会议上力主替日寇招工五千，张兰臣无恶不作竟敢偷搬潮州义山亭铁条”为题的文章被刊载。文章中先是讲述了 7 月 12 日重庆中央电台对陈守明、张兰臣、伍竹林、云竹亭等 7 人发出警告，然而陈等人对此置之不理，继续就日本在最近征集泰缅铁路建设劳工一事，“陈逆守明随即召开会议讨论，会中多人均主张拒绝，独陈张两逆则力主接受。”同时，该报还发表说，陈守明在这次会议上表示“中央警告由其警告，侨社责骂任其责骂，日方之要求却不能不执行。”这份报道既写出了在日本方面压力的面前陈守明总商会主席的苦恼，也显示出了共产党接近总商会干部的这一事实。本文前半部分提到过，陈守明于 1945 年 8 月 16 日被暗杀。

国民党蓝东海领导发行的《中国人》，在 1945 年 6 月 20 日的报刊上以“轰动全泰之空前锄奸大汉奸廖石峰被刺重伤”为标题大肆宣扬这次恐怖事件。廖石峰是台湾医师王镜秋（1945 年 8 月 11 日被暗杀身亡）主宰的反对抗日团体的成员之一。制造这次恐怖事件的组织干部还在《中国人》中耀称“本月五日下午一时，公司廊四角半岛酒店前，发生轰烈神圣之锄奸事件一宗，爱国志士于执行其勇敢之任务后，从容离开”。

<后记>

¹³⁶ 以上详情为吴维实直接从威洛·安派处得知。Damri Ruangsutham（吴维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泰国的抗日劳工运动》曼谷 Sukhaphapchai 2001 年 244-248 页。

¹³⁷ *Mahachon*《玛哈春》报纸 1944 年 12 月 26 日，《全民报》1945 年 11 月 2 日。

¹³⁸ 《泰华商报》1945 年 9 月 13 日。

¹³⁹ 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香港 见证出版公司 1992 年 360-362 页。

¹⁴⁰ Damri Ruangsutham（吴维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泰国的抗日劳工运动》曼谷 Sukhaphapchai 2001 年 213-218 页，276 页。泰国归侨联谊会编《湄江风云》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3 年 6 页、217-222 页。根据泰国共产党的原政治局委员乌道姆·史斯万先生(Udom Sisuwon 此人姓史)回忆，“当时共产党的活动仅局限于出版了《真话报》，偷取日本仓库物资，以及在日系工厂里进行怠工而已。……战争期间发生在日本工场里的怠工事件并不是整体的大运动，我认为是一部分组织策划的活动。战争接近尾声时，余松自命为司令官在合艾(Hadyai)组织成立了 20~30 人的战斗部队，但还没等到正式开始活动，战争就结束了。”（1992 年 12 月 25 日乌道姆·史斯万先生的采访录）。

本文分析了从1941年日泰同盟成立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为止的泰、日、华侨三者间的关系。使用的绝大多数资料都是前人研究中没有被使用过的泰语和中文的第一手文献。本论文的内容可做以下归纳。

在日泰关系的时期划分上，可以将1943年上半年为分水岭，划分为轴心国优势期（第一期）和同盟国优势期（第二期）。进而，这两个时期还可以各细分为两个小时期，即第一时期分为：1、从开战数日后到1942年中期，銮披汶期待搭上日本便车的对日全面合作期。2、由于对日合作的不满和害怕日本对泰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泰国尝试远离日本并逐渐从主观认定为中立的时期。第二时期分为：3、在轴心国失势的情况下，从进一步远离日本到进行抗日准备的銮披汶政权末期。4、1944年8月以后，反銮披汶派文职政权的宽内阁改善对日关系及其背后的自由泰运动展开时期。以上所述总共可分为4个时期。

如上所述，日泰关系的好坏对华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第1时期里，泰国对日本所提倡的东亚新秩序也抱有很大希望，欲借此实现本国的大国化。銮披汶在这个时期里与日本一同高唱“亚洲人的亚洲”。到战前为止，一直支持着重庆活动的华侨在日泰结合为同盟后，被迫不得不支持南京汪精卫政府。泰国作为日本对亚洲宣传的一大中心，其国内印度人和缅甸人的活动也变得活跃起来了。对于銮披汶政府强硬的政策，广大华侨从战前开始就采取了服从的态度。大多数的华侨领导人在这个时期里对于銮披汶依然是保持着容忍。当然，对他们的这种态度起到决定性影响作用的还是与进驻到泰国的日军的存在有关。得到泰国政府的配合后，日军的华侨政策也比较顺利地得以实施，因为广大华侨没有采取什么大规模的反抗，日军也无需为如何去镇压华侨而费脑筋。尽管，日本在处理像中华总商会，《中原报》等这些从战前开始就已存在的华侨组织时稍有周折，但还是采取了保持原封不动的方式利用这些组织团体。泰国政府一直担心华侨会背叛自己投奔日方，因此对日本在华侨问题上的单独做法一向非常不满，同时对两者的关系也一直是疑神疑鬼。

在第2个时期里，銮披汶渐渐开始疏远日本，同时将日本和华侨同样作为给泰国带来了厄运的外国人看待。銮披汶在这个时期里继续坚持其强硬的对华侨政策，从1942年末到1943年初，在泰国国内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内下达了驱逐外国人的命令，几万人华侨被迫离开了自己多年生活习惯了的土地。特别是在北泰6府，銮披汶不仅下令强行驱逐广大华侨，同时也坚持将日本人驱逐出境。1943年3月，日军基于日泰同盟，要求泰国政府配合其征集泰缅铁路建设所需劳工之时，銮披汶拒绝在泰国人中间进行征集，而是强行将华侨劳工提供给日方。这期间，中华总商会代替銮披汶政府多次对华侨招工，其中有一半左右是在强制下进行的。此外，在费用集资问题上也是由华侨商人在总商会的规定下被迫缴纳的。中华总商会事事顺从銮披汶政府，共为日军提供了2万多人的劳工，其中绝大多数为华侨。可以说銮披汶政府将日泰同盟的重压在很大的程度上转嫁到了在泰华侨的头上。在第2时期里，由于銮披汶的强行招工，设置外国人禁止区域，加上其歧视性的泰国人职业保护法令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广大华侨对銮披汶政权怨声载道。

在第3个时期里，銮披汶欲投奔同盟国一方，开始尝试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尽管这个时期里的日泰关系极度恶化，但銮披汶对此并不在意。銮披汶在这个时期里，对华侨的强硬政策有所缓和。日本当时控制了唯一一家受泰国政府批准的中文报纸《中原报》。泰国政府在这个时期里，不但批准了另一家与其对抗的重庆派人士出版的中文报纸《泰华商报》的发行，而且在该报纸受到日方干预的时候也出面进行了保护。

到了第4个时期，鹿死谁手的大局变得明朗化。驻泰的日军在得到增援后，欲以武力方式来解决与泰国间诸般矛盾的可能性大幅度增加。宽新政权不但力图改善在銮披汶政权末期里变得极端恶化的日泰关系，也着手对銮披汶政权下强硬的华侨政策进行改革。在这个时期里，华侨地下组织和自由泰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华侨对日本的配合完全变得形同虚设。虽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地下抗日活动在这个阶段里的规模都不太大，但却搞得非常活跃。对华侨而言，比起对于日军的恐惧心理，被当作汉奸走狗处置对象的恐惧则更为深刻。

（付记）

- ① 本论文是以1995年11月3日至5日在湘南国际村召开的《日本在东南亚历史上的占领 其评价和定位》研讨会上发表的内容为基础，经过几度修改后最终定稿。姜元武翻译后，郑成（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助教）加以审阅。在此，对两位谨表谢意。
- ② 本论文近期将刊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亚细亚太平洋研究中心纪要《亚细亚太平洋讨论》第7号（2004年10月发行）。

